在創叢書

文化形態史觀

附錄

卷頭語

我與雷先生這些文字，多少是根據於形態歷史觀的立場而寫作的。兩人的若干結論雖未必盡同，但大體上彼此可相輔爲用。雷先生較偏於例證的發凡，我較偏於「統相」的闡釋。各篇的發表，時期不一，場合各殊，前後的立意與用詞，容有略異。現在仍照原文重刊於此，一是聊爲作者思想的發展過程留些鴻爪，二是小處的差異並未妨害到各篇中之大處的一貫看法。

我們兩人的文字，當然由兩人各負其責。同時，兩人彼此的見解，也斷斷不是這幾篇文字所能賅括的。我這裏不妨且爲我個人的見解簡單說明。就是，如果我所提出的已往文化三階段之說大致不誤的話，那麼，下列幾點，凡是討論中國文化再建設者似乎應當認清：

（一）所謂中國社會中現存的「固有文化」，它的整體乃是國史二千年來（秦至清）大一統皇權階段的遺產；它的基本形態實在與二千年前列國階段（春秋戰國時代）以至封建階段

（殷商後期至西周）的固有文化大大不同。雖然二千年前的概念與儀式也有若干流傳到今，而自從透過了二千年皇權逐漸高度化下的解釋與應用之後，實際上一切的一切都另有意義，不復是當日的本來面目

（二）西洋文化則正在熱鬧經歷着它的列國階段的高峯——就是戰國時代。儘管在這次世界大戰進展中，若干方面已顯露出「超列國而入大一統」的徵兆，但國際間趨向複雜，形勢尚微妙，列國階段決不會因這次大戰的結束而結束；它還要享有相當長期的活躍前途。

（三）這個列國高峯的西洋文化，雖然在它自家體系內矛盾層出，亟待調整，但它向外膨脹力的強盛，此後只怕有加無減。世界上其他文化體系，面對着這個撼動全球的力量，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而求不被毀滅，勢必須決定一個及時自動的「適應」。

（四）中國百年來的基本的基本問題可說是一種難產問題，一種爲了圖求適應西洋文化以取得新生的難產問題。難產的根本原因，可以簡括界說：二千年大一統皇權積弊的底質，與西洋那些列國高峯的色色般般，距離太遠，了解難，而吸收活用尤其難。

(五)就幫助解決這個難產問題而論，形態歷史學似乎有它的應時而生的功用。就是，從客觀上說明了中西文化彼此現有階段的色色般般，以便揭開了彼此基本形態的基本異處與其所以異處之後，大家可以得到一個較分明較扼要的鳥瞰形勢，來按索出來一個文化適應與新生的程序。

(六)這程序的細節當然千頭萬緒。但一點基本事實，必須把住。中國當前文化問題「核心」，絕不容與西洋的混為一談——雖然彼此「邊緣」或有相共之點。西洋問題的核心是如何調劑五百年來列國階段內若干形態的矛盾；中國問題的核心是如何起若二千年大一統皇權下種種形態所積成的痼疾。換句話說，西洋文化性激發與國命整合兩潮流下相激相盪地發展，其毛病在「活力亂奔」。中國文化在官僚傳統僵化一切下支持延長，其毛病在「活力頹萎」——內在外在，都嫌活力頹萎！

(七)如何是好呢？曰：救大一統文化之窮，需要「列國酵素」！在西洋今日，或嫌列國酵素太多，在中國今日則欠缺正在這裏。也就是說，個性激發與國命整合兩大潮流所表現的

種種價值與制度必當盡量吸收。讓一般時賢們喃喃苦唸着「中國本位」或是「全盤西化」，我們可不問中西，只問如何能把這個蹣跚大一統末程的文化，儘可能地轉化為活潑健全的「列國型」——

(八)「列國酵素」，從古今各體系文化所各有的列國階段內，都可取資。但最當注意的淵源，應是下列兩處：(一)最豐富的淵源——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洋；(二)最親切的淵源——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我們對這兩個淵源的種種形態，要從一種忠實探索與體驗中取得吸收與活用之結果。最忌的是我們近年來的兩種趨向：(一)死抱着「大一統」的混同眼光，把一切之「異」都要解說得與我「將毋同」；(二)硬擺起「大一統」的萬有源頭，認中外古今本早在我們「固有」的囊中。估量「列國型」的價值，我們最先要拋棄「大一統型」的驕態與執見。

(九)最後還要補充的：列國酵素，作用在重新喚起內在外在的活力。為避免西洋過去那種「活力亂奔」的流弊起見，我以為還有一點鹹素期期必需：就是貴士標格的重建。因為只

有建築在一種重建的貴士標格的基礎上，然後可以希望個性運動不流爲庸俗與虛無，國命運動不流爲專政與戰爭。

前途是艱鉅的，但充滿了大可能。事在人爲。文化是人造的；由人造壞的，還是可以由人造好。我相信這數年的抗戰已經在我們社會上的若干份子中磨鍊出一副堅決的意志和一對犀銳的眼光，對未來可以不庸擾，不自逃，使我們終有一天要突破歷史遺留的羅網而涵育出一朵新階段的文化之花。

林同濟　三十二、二、九。北碚

形態歷史觀

林同濟

（一）

我去年「戰國策」創刊發表「戰國時代的重演」一文以後，（該文曾由大公報轉載）前

後方報章雜誌相繼發出不少反應的音波，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我拜讀之餘，覺得這些正面反面的迴響，與其說是對我所論列的本身下一番切題的討論，不如說是借我所提出的題目來宣布各人心中預定的主張。在這種論戰程度未能發生扼要交點的時辰，我想取妥當的步驟也許還是再進一步把我個人的見解作一個更賅盡的說明。

我寫「戰國時代的重演」一文時，腦後本來隱藏着兩個根本的問題：（一）學術方法論，（二）文化歷史觀。戰國重演不過是我的歷史觀的一部分，而我的整個歷史觀又是根據某一種方法論產生出來的。這裏相互間乃有了甚密切的聯繫。

關於方法論——一個根本又根本的問題——我以爲中國學術界到了今天應當設法在五四以來二十年間所承受自歐西的「經驗事實」與「辯證革命」的兩派圈套外，另謀開闢一條新途徑。憧憬展望之中，我把它名叫「文化統相法」。粗淺的發凡，曾有「中國的第三期學術思潮」一文論及（戰國策十四期），詳情改日再談。此處要提醒的，這種建議，並不是主張回到中古的蘇夢恍惚的「玄學」辦法，（郭沫若先生去年十月間在重慶文化座談會對我的評

語——見大公報。）大凡對歐美三四十年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發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曉得他們各科門的權威學者正在如何不謀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邁進。其中尤堪參照的，我認是所謂「歷史形態學」（Morphology of History）者。我不打算在本文有限的篇幅內，討論歷史形態學以及這形態學與我所謂統相法的異同，讓我且把統相法所探到的一個文化歷史觀，提供出來以就正於讀者。爲簡便起見，無妨且把它叫做形態歷史觀。

（二）

研究文化——歷史上發生作用的文化——第一步關鍵工夫就是要斷定文化的體系。抓着文化內的零星物件（如馬鞍、繡品、印刷等等）或個別制度（如婚姻、承繼、祭祀等等），分途尋覓他們的起源、傳播、發展等等：這叫做「文物」研究，不是「文化」研究。認文化爲籠罩全人類的公有現象，根本上分不出中外東西，於是就把他看着「混同體」（Culture in the lump），而津津窮究其性質、內容、變遷等等：這叫做「抽象文化概念」的空論，不

是歷史上「有存在的文化」的研究。

歷史上眞實存在的文化是分有若干體系，佈在各個空間時間的。例如古埃及文化是一個體系的，印度文化又是一個體系的，中國文化。希臘羅馬文化，歐美文化也都是各成體系的。（如何斷定文化體系，而文化體系又共有若干，參閱(A.T.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以古今來所有眞實的文化體系爲單位，而有系統有步驟地對他們各方面「形態」作一番詳盡精密的比較工夫，認識工夫，這不但是最自然應有的辦法，而且可以使我們發現無數大大小小的事實，都充滿了無窮的實際意義的。

說來奇怪，却是千眞萬眞的事實。在過去歷史上，凡是自成體系的文化，只須有機會充分發展而不受外力中途摧殘的，都經過了三個大階段：（一）封建階段，（二）列國階段，（三）大一統帝國階段。

尤有妙者，在每個階段中，雖各體系的文化都各有獨一無二的特徵（在這方面看，歷史不重演）；但同時却也多少都要表現出來若干根本形態，彼此大致類同（在這方面看來，歷

史劫重演）。

（三）

封建階段是「原始人羣」與「文化人羣」的分界。許多人羣永留滯於「原始」狀態，創不出封建的局面，但一創出封建的局面，這人羣便大步踏入「文化大途」。

封建階段的中心形態與作用是拋棄了原始氏族的「單純混一」的組織(Homogeniety)，而大膽地創造出一個極端複雜而「差別」的結構(Hier archy)。它把社會上人羣横截而成為統治與被治兩大層級，或且更進而作更精細的區分，然後在各層級間再硬劃出一種「距離」，一種「閾限」，尤其是尤在那統治與被治的基本層級間，建築了一條最顯著的横形鴻溝，鴻溝的上下，原則上絕對隔斷，不容踰越。

原來「上下」兩字就是封建階段的「時代標誌」。一切行動，一切價值，都要以這兩字為根本標準。一切物質精神的設施，為的是要維持這個「上下謹別」的結構，也為的要維持

這個結構，才會有一批傑出人物絞盡腦汁以想出種種新鮮複雜的花樣，的辦法，的文物制度。具體點說，封建階段就是貴族中心或貴士中心階段。一切創作出自他們，一切創作也爲着他們。層級結構也就是統治貴族處處佔便宜的結構。因此，凡到了封建階段，下列各形態都要逐漸發生：（一）政治必是「封君分權」：庶人當然「不議」，卻是大家公認的「共主」，也不過名義享尊嚴，實際無主權。（二）軍事必是「貴士包辦」：從戎作戰是統治者的特權，庶人最多不過佔一種「副力」的地位。（三）經濟則類皆是「農奴采邑」：生產的「人」與「物」，多少都「凝滯」在封君勢力圈的內圍。（四）宗教則主要在祭祖先，拜英雄，（除非有外來階段較老的文化的宗教影響中途滲入）再加以天地山川神祇的信仰。直接事神的資格往往只限制於統治層級；庶人對貴族神祇，不是根本無預，便是只許間接溝通。

這般嚴格的偏祖組織，專門搾取下層，太欠公道！然而，從文化創造的事實過程看，這裏却存有一層偉大的作用：在那「距離」，在那冷酷的「區分」中，前此混一無別的人羣乃無形中逐漸誕生兩種相反相成相激相引的看法，的態度與努力，——就是由上看下而產生的

自高與自持，以及由下盤上而產生的景仰與嚮往。也就是說：「貴士傳統」（Aristocratic-Tradition）的形成以及這傳統在整個社會中的「引昇向上」的功用。詳情不能多談。（請轉閱本冊「文化的盡頭為出路」一文）只讓我這裏告訴大家說：貴士傳統乃是任何文化體系的生命活泉源。

但，封建的層級結構，為了內在腐化的原因，終究都要經過一番「社會大革命」或大騷動」而消潰下來。逐漸代興的，便是列國階段。

（四）

列國階段照例要發生兩重的基本作用：（一）它要在層級結構塌倒的殘基上，佈置一個「平面化」「平等化」的社會；而同時（二）又在這平面化社會上頭，建立起若干森嚴對峙的政治壁壘——就是「國家」。換句話說，一切的列國階段都產生兩種最深入最泛的大潮流：（一）個性的渙發；（二）國命的整合。

這兩大潮流往往同時產生而並肩推進。但仔細看去，個性潮流要在列國階段的前期特形活躍，愈向後期發展，國力運動愈要把佔上峯。其實，國力潮流始終是這階段的主題。我們把這階段叫做列國階段，原因就在這裏。

個性潮流，根據着個人才性的尊嚴與活力而主張自由平等，是一種離心運動，針對着封建階段的層級束縛而奮起的。它的具體形態的表現，雖然各文化體系各有出入，而犖犖大端類不外庶人入仕，民衆入伍，商人經濟活躍，宗教信仰放任等等。最能夠象徵這段潮流的，恐怕就是理智應用的發達，蔚成爲百家爭鳴的學說。

國命潮流，注重統一與集權，是一種向心運動，目的要在層級結構打翻後，再把那些日形「原子化」Atomiezd，「散沙化」的個人收拾起來而重建一個新集體。具體形態的表現，多半包括政權集中，軍權統一，經濟干涉，國教創立等項。最適當的象徵可說是百家爭鳴後所多少都要產生出來的思想統制的主張。

個性潮流代表「創造衝動」，國命潮流代表「秩序要求」。兩者之間，一面相尅，一面

相成，到了最後，國力潮流按例壓制了個性潮流的時辰，國命潮流的本身也就往往達到飽和點，（變爲機械性，）而不久也要淹沒於大一統帝國的洪水滔滔裏面！

列國階段是任何文化體系最活躍，最燦爛，最形緊張而最富創作的階段。有了列國競爭的局面，多少可以減輕個性潮流陷入放蕩享樂的危險；有了個性的伸張，多少可以維持國家最後活力的來源。同時，距離封建階段尚不太遠，個性潮流的推進得着「貴士遺風」的薰陶，多少也可免登時「庸俗化」（Plebeianization）的危機。這一點似乎可以肯定的：一個文化所可能達到的最高峯就是列國雛形，個性發展與貴士遺風三大原素恰得個調和狀態的歲時。

中國歷史上的列國階段就是通常所稱春秋戰國時代。「春秋」與「戰國」兩個名詞可算是中國史家大手筆的絕妙創品。我們可以借用到其他文化體系上，把一切階段前期叫做春秋時代，後期叫做戰國時代。這兩時代間，當然也有其不同的形態。大體說來，春秋時代，貴士遺風尚盛；戰國時代，則各列國透過了集權運動，開始傾全力以向國際之場作全體戰，殲滅戰，所謂貴士遺風也就在那種高度的戰神威力下斷送無餘了！（參閱本冊「戰國時代的重

演」與「中外的春秋時代」。）

全體戰殲滅戰的最後結果，是一強吞諸國，而製出一個大一統帝國，它多少都要囊括那文化體系的整個區域。

（五）

如果封建階段的基本形態與價值是「上下謹別」，成熟的列國階段（即戰國時代）的基本形態與價值便是「內外嚴分」。這期間的最大鴻溝不是「橫亙」於社會層級之間，乃是「縱豎」於國與國之際。所以，在這期間內，儘管各列國內的層級間（或較切當些說，階級間，個人間，時常發生翻天覆地之衝突，結果總突不破那基本的「時代界綫」——即國界——而釀爲真正的整個國際運動。反過來說，倒是外戰往往可以止內爭，要安內最好是攘外。到了大一統階段呢？情形又不同了。那時候，內外之別也被打破，雕鑄出來的乃是一個「大同」模型。大同者，可解釋爲縱無劍拔弩張的敵國，橫無凝固不變的社層。在一個「無外」的天下

之中，「無別」的兆民之上，建立一個高高懸空的獨尊的專制皇權——這就是過去一切大一統階段的使命！

一個文化行到大一統階段，最迫切的慾望就是「太平」。封建階段「持於尊」Honor，列國階段「爭於力」Power（韓非子語），大一統階段卻一心一意要「止於安」Security。開始百年間，文韜武功往往還能夠顯出一時的盛況。過此以往，除了偶爾復興的短期外，始終找不出眞正有效的法子避免一種與時俱增的老年「倦態」Ennui：不求向上昇高（封建現象，不求向外澎漲（列國現象），焚香禱祝，只求「天下無事」！

所謂「無事」者，內不可有革命，外不可有戰爭。因此，凡是最成功的大一統帝國多少都要做到兩點。（一）完成一種「選賢用能」原則下的官僚制度以調劑「社會流轉」Social Mobility；（二）組織一種「持盈保泰」情緒下的皇家警防軍以「懷遠柔邇」Pax Romana。

那末，天下果然可以無事了嗎？曰，唯唯，否否！

在那無外無別的皇權結構下，凡百設施都要不斷受着兩種傾向的侵蝕：（一）敵愾意識消

失，一切作用「內向化」；(二)貴士遺風式微，一切品質「惡劣化」。內戰（地方叛亂，宮闈革命）變爲軍隊的主務，而軍隊本身逐漸成爲流氓的遁逃藪，政治再也不作縱橫開闔的壯觀，而流爲官僚功名利祿的把戲。戰國末期所加緊推行的經濟管制，隨着皇權的穩定，時勢的需求，也不免時時舊題重提，或竟大規模嘗試——然而，目的却完全對內，並且所謂「國營」「官辦」事業，開始都是爲國計民生，結果類多由私囊中飽。（參閱本冊「官僚傳統」與「中飽與中國社會」。）至於宗教呢？政府或竟要欽定一種「皇帝崇拜」Emperor Worship 來維繫人心，只無奈上流的士夫，透過了個性潮流中的理智運動，再也不能保持任何宗教式的「原始信心」；下流的大衆，輾轉呻吟於淫威災患裏，只痛感悠悠天地，漠漠無依，乃設法自尋慰藉而創出種種雜教邪宗。後來這些雜教也許要匯集起來而成爲一種混合式的民間信仰，恰恰與上流士夫們的泛神式的自然哲學上下對襯而作爲這階段內宗教情緒的清濁兩端。等到自然哲學再蛻變爲虛無主義Nihilism，民間雜教或蕪濫而成流寇暴動，而帝國的政治生命也往往就借手於「蠻夷入寇」Boypoyion Invosion，而結束起來。即使後來有機會復興

，而整個文化的「人」「物」兩方面的表現，始終擺不脫「頹萎」的色彩與精神。

(六)

以上所述的三大階段是過去一切文化體系的歷程。所舉出的若干具體形態，當然都是所謂「純淨標格」，實際上各文化也自各有出入。但大體的輪廓，不至太差。

我想讀者到這裏必定要提出兩問題：(一)目前正在表演戰國階段的歐西文化是不是也必定要踏進大一統階段？這個大一統階段的形成方式，結構，氣運，是不是必定要與過去的若干文化相同？(二)已經完成大一統階段的「古老」文化(例如中國)是不是還有可能性擺脫了一切「頹萎」色彩而捲土重來再創出一個壯盛的，活潑的，更豐富的體系？

我的答案是：過去文化的歷程可以給我們以警告，但不能決定我們的前途。我們儘可以獨闢一個新前途，但也絕不容誤認這是一樁「反掌便得」的事務。想在難能之中，打出來一個「獨能」的境界——這要靠我們的眼光，更要靠我們的勇氣與力行。

三十、十二、三、寫於昆明

歷史的形態與例證

所謂歷史，有特殊哲學意義的歷史，並不是由開天闢地以迄今日演變的種種。歷史的時間以最近五千年爲限。前此的發展是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與人類學的園地，與正當的歷史學無關。舊石器時代的各種人類，與今日的人類，屬於生物學上不同的物種，我們雖也承認他們爲「人」，但他們究竟「非我族類」，他們的活動與我們的活動在根本上大異其趣，不能用同樣的標準去衡量。進到新石器時代，有了一種新的人類，那就是我們今日世界上已開化與未開化的各種民族的祖先。但在公元前三五〇〇年以前，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文化，仍然一脈相通，北非與東亞之間，或西歐與中亞之間的新石器文化，並無顯著的分別。所以此一階段也仍屬於人類學的範圍。

但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或略前，最早或可追溯到三五〇〇年左右，不知由於何種外來的影響或內發的力量，在清一色的新石器世界中，有兩個地方發生了變質的作用，就是埃

及與巴比倫。自此以後，地面各處或先或後的都脫離了石器的階段而進入歷史文化的階段。據今日所能確知，五千年來的高等文化區域共有七個：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歐西。

直到百年之前，大家都認歷史為一元的。雖至今日，文化一元說仍然相當的盛行。這種觀點甚為自然。各民族無不保有惟我獨尊的態度，視四方為蠻夷狄，認文化為以我為中心而一系相傳的發展。在交通不便的時代，這是再自然不過的心理形態。前代的中國，古代的印度，古典的希臘羅馬，以及遠古的埃及與巴比倫，無不自視為天之驕子，無不自命為文化至寶的唯一創造者與維繫者。直到如今，在歐美各國，連許多以客觀自詡的學者，有意無意間仍不免以歐西文化為起發點而衡量古往今來的一切。但交通的大開，與考古學的空前收穫，使心胸寬大眼光銳利的一些學者，把前此的文化一元論完全放棄，認為歷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地域各個獨自產生與自由發展的。考古的發掘，使我們知道有許多被後人忘記的偉大文化；交通的便利，使我們發現遠方有許多前所未聞的異樣民族。這許許多多時

間與空間都不相同的歷史單位，經過多人與多方的探討，雖無人否認他們各有特殊點，然而歷史進展大步驟的公同點，現在已逐漸成爲學者所公認的現象。這種公同點，就是歷史的形態。

在一個文化的發展上，第一個階段就是封建時代，前後約六百年。此時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現象都很特殊。政治上的主權是分化的。在整個文化區域之上，有一個最高的政治元首，但這個元首並不能統治天下的土地與人民。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當時不過一種理論與理想而已。元首所直轄的，只有天下土地一小部份的王畿；並且在王畿內，也有許多卿大夫的采邑維持半獨立的狀態。至於天下大部份的土地，都分封給很多諸侯，諸侯實際各自爲政，只在理論上承認共主的元首。但諸侯在封疆之內也沒有支配一切的權力，他只自留國土的一小部份，大部土地要封與許多卿大夫，分別治理。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之上，也非絕對的主人，采邑的大部又要分散於一批家臣的手中，家臣之下，可有再小的家臣，以此類推，在理論上封建貴族的等級可以多至無限，政治的主權也可

一層一層的分化，以至無窮。實際的人生雖然不似數學的理論，但封建政治之與「近代國家」正正相反，是非常顯明的事實。

封建時代的第二個特徵，是社會階級的法定地位。有史以來，階級的分別是一個永恆的事實。但大半的時期，這種階級的分別，只是實際的，而不是法律所承認並且清清楚楚規定的。只是在封建時代，每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等級，業務，權利，責任，下至衣食住行一般日常生活的方式，都是由公認的法則所分派的，並且階級的地位是世襲的，貴族的子孫，世世代代永為貴族，平民的子孫，世世代代永為平民。同一貴族或平民的階級之內，往往又有許多小的等級或職務的分別，小分別之間的界限往往也是相當嚴格的。

封建時代的第三個特徵是經濟的特徵，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產。自由買賣，最少在理論上不可能，實際上也是不多見的。所有的土地都是一層一層的向下分封，分封的土地就是采地。土地最後的用處，當然是食糧的生產，生產食糧是庶民農夫的責任，各級的貴族，由最高的王公以至最微的士子，都各把他們直接支配的一部土地，分給農夫耕種。

由這種農業經濟立場看，土地稱爲「井田」或其他類似的名稱。此中也有「封」的意味，絕無自由買賣的辦法。井田可說是一種授給農夫的「采」，不過在當時「封」或「采」一類的名詞，只應用於貴族間的關係上，對平民不肯援用此種高尚的文字而已。

在精神方面，封建時代是宗教的天下。國家的每種大典，婚喪生育的人生大事，以至團體或個人的許多例行事務，幾乎都爲宗教的規則所圍範。宇宙間充滿了神力，大小的神祇可以多至不可勝數。一般人對於神靈既然恐懼，又須依賴，有時敬愛的心理也能發生。無論是恐懼，或依賴，或敬愛，一概都要由崇拜的外儀來表現。

歷史的第二個階段，可稱爲貴族國家時代，前後約三百年，是一個以貴族爲中心的列國並立時代。封建的晚期，當初本不太強的中央共主漸漸全成傀儡，有時甚至整個消滅。各國內部的卿大夫以及各級的小貴族也趨於失敗。奪上御下，佔盡一切利益的，是中間的一級，就是當初封建各國的國君。最後他們各把封疆之內完全統一，使全體的貴族都聽他們指揮，同時他們自己卻徹底脫離了天下共主的羈絆。天下的共主至此失位或者完全消滅，或者名存

實亡。主權分化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整個的天下雖未統一，但列國的內部卻是主權集中的。社會上的士庶之分，在理論上仍然維持，在政治各部門輔助國君的也是貴族居多。但平民升為貴族，實際已非不可能，並且也不太難。在經濟方面，井田一類的授田制尚未正式推翻，但自由買賣的風氣已相當的流行。各國內部已統一，小的紛亂當然減少到最低的限度；至此只有國際間的戰爭，而少見封建時代普遍流行的地方戰亂。貴族階級在封建時代已經開始修養的俠義精神與斯文儀式，至此發展到最高的程度，在不與國家的利益衝突的條件之下，他們對待國界之外的人也是盡量的俠義有禮。國際的戰爭大致仍很公開，以正面的攻擊為主，奇謀詭計是例外的情形。戰時的死傷並不甚多，戰場之上也有不可輕易破壞的禮儀。戰爭的目的只求維持國際的均勢，沒有人想要併吞天下。國際的戰爭雖然難免，但天下的大局是大致穩定的。

在精神方面，宗教仍佔重要的地位。但唯理的思想已經開始，漸盛，最後發展到極峯。一個文化對於宇宙人生問題的偉大解釋與偉大答案，都產生於此時。偉大的哲人與詩聖，也

都是此時的人物。

文化的第三個階段，是帝國主義時代，前後約二百五十年。第二第三兩期之際，必發生驚天動地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的大革命。革命的結果，貴族階級被推翻，過去日漸得勢的平民階級，至此奪得政權。臨時在表面上實現了一個全民平等的社會，最初的一百年間，政治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往往可謂大體美滿，但社會的騷動與國際的大戰很快的就把這種美滿的境界毀滅。階級既然取滅，全民既然平等，大家就都有効命疆場的義務。當兵，在封建時代是貴族的權利，貴族國家時代的軍隊仍以貴族爲主，平民的小兵完全要受貴族將官的指揮。進到帝國主義時代之後，全民皆兵的徵兵制成立，大規模的戰爭，慘酷無情的殲滅戰，成了國際野心家所專研的戰爭方法。戰場以大量的屠殺爲最高的目的，以便消滅對方的實力，最後佔據對方的領土，滅掉對方的國家。前一時代的斯文戰爭，至此已不再見，列國的數目，尤其是强國的數目，日漸減少，最後只剩三兩個大國，各自率領附屬的小國，互作死拚的決戰。

在不斷的大戰與大亂之中，文物開始遭受浩刼。戰亂時無意的破壞，當然古今難免，但此時因戰爭的特別激烈，所以摧殘尤勵。並且在無意的破壞外，還有由於各國政策所產生的故意的文化摧殘。經過短期間思想自由的階段之後，焚書坑儒一類的辦法漸漸成爲常事。與國家政策不合的文字，對於當權者不利的文人學士，輕則被棄，重則被毀，被逐，或被戮。在思想方面，這是一個迴光反照的時代。短期之間，百家爭鳴，在表面上似乎非常熱鬧。但思想趨於派別化，偉大的創造思想家並不多見。最後連派別化的思想也趨於消沉，只剩下毫無中心見解的雜家，東拼西湊的去寫許多雜亂無章的大書。

文化的第四個階段是大一統時代，前後約三百年。長期的酷戰與大亂之後，一國獨強，併吞天下，實現了封建時代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就是整個文化區的大一統局面。至此，無論名義如何，政治必然是專制獨裁的。此時人心已感疲倦，精神漸漸不支，不能再過從前那種緊張悲壯的生活，不能繼續維持過去那種豐富複雜的文化。專制的皇帝與他的左右，現在替天下的人解決一切的問題，個人無需再過分的努力自苦。天下大致是太平的。內亂當然難

免，邊患也不能卻除；但兵荒馬亂的事，的確較前大為減少，一般人的物質生活大致安逸。但這只足更加增進心理的鬆懈與精神的渙散。社會的頹風日愈明顯，最後一瀉千里，不可收拾。尚武的精神急速的衰退，文弱的習氣風靡一世，徵兵制不能維持，只得開始募兵，最後連募兵都感困難，只得強徵囚犯奴隸，或召募邊疆歸化的夷狄來當兵。但在最後的崩潰尚未來臨之前，帝國的疆域往往可以擴展到空前的程度。許多邊外的夷狄，但在最後的崩潰尚未來臨之前，帝國疆域往往可以擴展到空前的程度。許多邊外的夷狄，或因慕化，或因畏威，都歸順投降。帝國也自動的征服許多新土。但表面的龐大，並非內在偉大。毀滅的命運很快的必然來臨。

思想學術與文藝，都急劇的退步。思想趨單調。政府受了潮流的影響，往往也推進思想一尊的趨勢。或因政見的不同，或因文人的偏激，政府時常與思想界發生衝突，大規模的焚書坑儒都是此時所演的慘劇。局面穩定之後，思想學術定於一尊，真正的哲學消滅，文人全失創造的能力，只能對過去的思想與學術作一番解釋，研究，與探討的工夫，並且其中時常

夾雜許多附會，誤會，與望文生義的現象。一言以蔽之，文化至此已經前途若非很快的死亡，就是長期的凝結。

第五個文化階段，最後的時代，是政治破裂與文化滅亡的末世。時間不定，可長可短。這是三百年大一統時代後無從倖免的一個結局。政治日愈專制，日愈腐敗，日愈野蠻。社會的機構，一代不如一代；最後極端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主義，變成社會生活的主要原動力。內亂迭起。外患也因而日愈嚴重。當初燦爛的文明帝國，往往被邊疆的蠻夷侵佔征服。古老的文化，從此可以一蹶不振，以致死亡。有時外族被同化，文化臨時又有短期的生氣，但同化的外族，不久也腐化，又被其他的外族征服。傳統的政治文化，最後總有完全毀滅的一天。

這些是一般文化歷程的梗概。現在讓我們提出具體的例證。

（一）埃及文化

埃及文化是世界上最古的文化之一，只有巴比倫可與它比擬。因典籍亡佚，哲學的發達

無從稽考，但古老埃及的政治社會演變，從我們今日所能知的約略情形，可見其也不出歷史形態的範圍。

埃及的封建時代，普通稱爲舊王國時代，又稱金字塔時代（公元前二八〇〇至二一五〇年）。王室爲政治文化的中心，諸侯分立各地。王權有限，「法老」只爲名義上的天下共主。

埃及的貴族國家時代，普通稱爲中期王國時代（公元前二一五〇至一八五〇年）。王室衰微，諸侯獨立，許多小國相互爭衡。這就是許多西洋史學家所誤認的「封建時代」。眞的封建時代已經過去，此時最多不過只保留一些封建的痕跡而已。

帝國主義時代，稱希克索斯 Hyksos 時代（公元前一八五〇至一六〇〇年）。希克索斯人是一種來歷不明的外族。他們入侵埃及，很快的埃及化，臨時成了埃及內部最强的勢力，與舊日的埃及列國爭勝。此時戰事日烈，儼然一個具體而微的戰國局面。最後，一個大一統的埃及帝國成立。

大一統時代普通稱爲新王國時代，或新帝國時代（公元前一六〇〇至一二五〇年）。此時埃及大拓疆土，西至今日利比亞的沙漠，南達阿比西尼亞，東抵巴比倫之地。

公元前十三世紀中期以下，埃及一方面內亂迭起，一方面又屢次被野蠻的外族征服。但因這些征服者文化幼稚，先後都爲埃及所同化。公元前五二五年，波斯入主，這是埃及初次遭受一個已經開化民族的征服，埃及文化染上了不少的波斯色彩。公元前三三二年，亞歷山大成了埃及的主人，埃及於是又與希臘同化。到公元前三〇年埃及變成羅馬帝國一個行省的時候，在文化上已經完全是希臘的附庸了。不僅舊的制度文物蕩然無存，連傳統的語言文字也趨消滅，除了少數偏僻區域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只說希臘語，讀書的人也只讀希臘書。埃及民族與埃及文化至此可說已經絕跡於天地間了。六七百年之後，公元六三九至六四一年間，埃及又被回教徒征服，就又毫無困難的亞拉伯化。今日所謂埃及人，無論血統如何，由宗教，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上言，其實大都是亞拉伯人了。

(二)希臘羅馬文化

希臘羅馬文化的封建時代，歷史上稱爲王制時代(公元前一二〇〇至六五〇年)。小國林立，各有國王；但王下有貴族，限制王權的行使。在衆王之上，有一時期曾有一個最高的共主，關於此點，荷馬的詩中仍留有痕跡，可惜史實已完全失傳了。宗教盛行，後世流行的神話都是此時的產物。

貴族國家時代(公元前六五〇至三二三年)的歷史，大致以雅典，斯巴達與羅馬三國爲中心，就是歷來史書中所稱道的希臘文化的極盛時代。內部統一的列國，羅佈在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外交的關係甚爲複雜，國際的戰爭也時常發生。但各國的內部，除羅馬外，始終不甚穩定。天下的共主早已消滅，多數的國內已把王推翻，同時又無固定的新制替代。王制最少可說是一種安定力，王制破裂，各國的政局時常都在動盪中。但無論如何的變化，各國的政治可說是貴族性的，因爲多數人或爲奴隸，或爲沒有政權的農奴。所謂民主政治，或全民

政治，也不過是全體人口中少數自由人的政治而已。哲學由興起而漸盛，晚期出了三大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帝國主義時代，普通稱為後期希臘與羅馬時代（公元前三二三至八二年）。此時地中海沿岸只餘五大強國，就是希臘化的埃及，希臘化的敘利亞，馬其頓，羅馬，與稍度羅馬化的迦太基。此外尚有一些緩衝小國，以希臘半島上為最多。五國中羅馬最強，最少可說羅馬的政策最為高明。它採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先毀滅了比較強勁的迦太基，然後併吞東方各國。迦太基之滅，甚為悽慘，不只國破，並且民族也全部被殲，僅剩下極少數的遺民，也遭流放異地的命運。至公元前八二年蘇拉 Sulla 獨裁，可說是地中海世界第一任的實際皇帝。此時的哲學只有舊日思想的演進，與幾種時髦一時的人生觀。斯多亞派，伊比鳩魯派，懷疑主義派，犬儒派，算是比較新穎的人生學說，此外則有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主義的信徒。最後調和一切的，也可說毀壞一切的，雜家出現，而古典的希臘哲學遂告結束。

大一統時代就是羅馬帝國的盛期（公元前八二年至公元一八〇年）。羅馬的疆土不只擴

展到整個地中海沿岸，並且在許多方面深入內地。今日意大利，希臘，保加利亞，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比利時，與瑞士的全部，德意志的西境，荷蘭，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的大部，伊拉克與高加索的一部，埃及與沙漠以北的整個北非之地，都是帝國的疆域。此外並在海外征服了今日的英格蘭，威爾斯，與蘇格蘭的南境。但希臘羅馬人的頹風日甚，公民漸都不肯當兵。起初還有內地的遊民入伍，最後就只剩邊地的日耳曼人與其他的外族還有執干戈的能力。頹廢的人心，除物質的享樂外，往往又向東方傳入的許多厭世宗教去求安慰。思想知識，只有以雅典與亞歷山大利亞兩城為中心的古代經典的研究。

盛世一個最後的偉大皇帝死於公元一八〇年，帝國逐漸瓦解。不婚，婚而不育的現象，相當的普遍。人口減少，品質似乎也退步。怠工與游手好閒成了社會的風氣，許多人寧受國家的救濟，而不肯從事正當的工作以自養。田地荒廢，無人經營。整個的社會，呈顯一種坐以待斃的徵象。日耳曼人入侵，不過是用手指彈倒一個行屍走肉的帝國而已。傳統所謂四七六年羅馬帝國的滅亡，實際不能由日耳曼人負責。羅馬民族與文化的消滅，更與日耳曼人無

關。

(三)歐西文化

歐西文化的封建時代就是普通所謂稱的西洋中古時代的大部（公元九一一至一五一七年）。名義上的天下共主，有兩人爭奪，就是羅馬的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各國分立，國王無權，各級貴族分據國內各地。農業集中於佃莊，與中國古代的井田相類。精神生活全由基督教籠罩。每人由出生，直至臨死，甚至死後，無不受教會的指導與約束。

貴族國家時代，歷史上稱舊制度時代（公元一五一七至一八一五年）。內部統一的列國成立，中央的共主失位。教皇只餘宗教的地位，政權盡失；皇帝僅擁虛名，但他的傀儡權位直到時代末期纔被拿破崙廢掉。舊日獨立的封建貴族，至此成爲輔助王政的特權階級。國際之間時起戰爭，普遍天下的大戰，由十七世紀起，平均每五十年一次，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一七〇一至一七一三年）。七年戰爭（一七五六

至一七六三年），拿破崙戰爭（一七九九至一八一五年）。除末期的拿破崙戰爭外，所有的國際衝突可說都是以維持均勢爲目的的。十七與十八兩世紀間，偉大的思想家輩出，末期的康德與詩哲歌德可說是集大成的哲學家。

一八一五年以下，歐西文化進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北美合衆國的地位日趨重要，所以我們可稱此期爲歐美文明時代。這個時代至今方逾百年，尚未結束，無從見其全貌，但大戰國的景象已經非常明顯。由大革命的法國開端，徵兵制普遍了歐美的世界。英美因地理形勢的安全，久想逃避現實，但今日也已被迫實行徵兵。百餘年來的戰爭中，殲滅戰與屠殺戰的形式，一次比一次的顯著。納粹所謂閃電戰不過是最後爲此種趨勢找到一個動聽的名詞而已。炮炸彈火的威力，不分前方與後方。傷亡與俘虜數目的龐大，在人類史上眞是空前。德國攻馬奇諾防線後，法軍被俘虜的在一百五十萬人以上，除少數老弱殘兵外，一般青壯的軍士至今尚未解放。他們目前所遭的摧殘，可以意度。至於他們將來的命運，誰敢設想！白起對付趙國降卒的手段，雖未必不折不扣的重演在今日，但雖生猶死的遭遇，安知不會發生？納粹在

佔領各國，因一二德人被暗殺而竟大批屠戮「人質」的慘劇，這豈非新野蠻時代已經來臨的明證？這一切不過是開端而已，歐美世界未來的大流血與大悲劇，恐非今日仍未忘情於十九世紀比較斯文的景象的人類所能想像！

文物的破壞，在歐美也已見端倪。相生相尅的道理，在文物破壞中最為明顯。歐美鋼骨水泥的各種偉大建築，甚至中世紀所傳下的純石塊的大禮拜堂，都非一般的「刀兵水火」所能破壞。但歐美的人類又精心的製造猛烈無比的砲火與炸彈，數十世代千辛萬苦所積累而成的文化標幟，多在狂戰中慘遭毀滅與損傷。到了大破壞的時代，文物的遭劫似為不可避免的命運。至於比較微弱的孤本古書，名貴雕繪，希世樂器，無論如何的善為保藏，或大或小的損害更難逃脫。除了這種雖非故意而卻似有命運存乎其間的文物浩劫外，焚書坑儒的事件也已由德國作俑。猶太人的著作或與國社主義相逢的作品，都被有系統的焚毀。猶太學者與非猶太而反納粹的文人哲士，重則喪命輕則被囚，幸運者得遭放逐或逃亡國外。此種焚書坑儒的風氣，將來恐怕也有日趨猖獗之勢。十九世紀百年間比較自由的思想與學術，恐怕只是暫

時的現象。目前宣傳已經取代思想的地位，不久的未來歐美人士或將不知精神爲何物。偉大的思想家已少出現，思想已開始派別化：康德派，黑格爾派，唯實派，實際派，以及各種巧立名目的派別。新的宗教精神也已萌芽，奇形怪狀的各種新宗教，流行在歐美的各大都市中。一種新的巫術，所謂靈學，雖有少數人用科學的方法與態度去研究，但對大多數問津的人卻成了自我慰藉與逃避現實的一服精神麻醉劑。

所以，無論由國內政治與國際形勢言，或由精神情況言，今日的歐美很顯然的是正在另一種作風之下，重演商鞅變法以下的戰國歷史或羅馬與迦太基第二次大戰以下的地中海歷史。歐美在人類史上若非例外，最後的歸宿也必爲一個大一統的帝國。但這或者仍爲百年以後的事。歷史的發展，自有其節奏與時限，速成班之類的辦法在歷史上是輕易不見的。時機未到，野心大於希特勒十倍的怪傑，也不能使大一統的局面穩定的實現。

(四)獨具二週的中國文化

除歐美的歷史尚未結束外，一切過去的偉大文化都曾經過一度的發展，興盛，衰敗，而最後滅亡。惟一的例外就是中國。

中國的文化獨具二週。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亂華爲第一週。由五胡亂華以至最近爲第二週。

（甲）第一週的形態

中國的封建時代，就是殷商西周，由盤庚遷殷至平王東遷，前後五百餘年（公元前一三〇〇至七七一年）。中央有一個王，又稱天子，當初是殷，後改周室。天子之下，各地有許多諸侯。諸侯之下，有卿大夫與各級的家臣。這是標準的封建金字塔。貴族與平民之間，界線森嚴。一切的農田，井田，都由貴族支配，分與平民耕種經營。殷周的宗教，雖多失傳，但由甲骨文，銘刻，與僅存的一點古代文獻，我們還可看出當時精神生活的中心就是宗教。

中國的貴族國家時代稱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一至四七三年）。諸侯多已統一境內，列國並立的國際局面成立。貴族階級仍然存在。但只能在諸侯統制下操持國政，不似封建時代

的隨便自行其是。國際間列國爭衡，天子已成了傀儡，只能承認最強的諸侯爲霸主。齊晉秦楚是四方的四强，它們大致只求維持國際的均勢，即或一國特强，也僅要作中原小國的盟主，並無吞併天下的野心，天下在理論上仍由天子統治。國際的戰爭雖多，然而並不酷烈，大家都服膺「適可而止」的道理。戰場之上，有謙讓客氣的種種禮教，俠義之士無不遵守。戰爭並不是一種拚命的死爭，而是一種有章有則的競賽。在精神方面，宗教的形式仍然維持。但少數的哲士對宇宙人生的問題探索甚深。可惜早期或有的作品都已失傳，我們今日所知的最早思想家是春秋末期的孔子與孔子早時的一些哲人。孔子是保守派，認爲舊制破裂，人心不古，是一切困難的根源。若能恢復封建時代的先王之道，天下就可太平無事。與孔子相反的一派，可以鄧析爲代表。他是革命思想家，認爲封建時代與春秋時代的舊制都已陳腐不堪，必須澈底掃除，代以全新的一套辦法，方可解決各國內部的問題與國際之間的紛爭。這種說法當然要遭在位者的恨惡，所以他終究被鄭國的執政藉故殺掉。第三派是消極的隱士。他們認爲世事已不可爲，不如一了百了，遁世埋名，獨善其身，最少還可賺得一心的清淨。孔

子周遊列國時，遇到不少這種的人，如長沮，桀溺，楚狂接輿，晨門，荷蕢，荷篠丈人等，都屬於此種自私自利的思想學派。

春秋末期思想界的矛盾與複雜，預示帝國主義新時代的來臨，就是戰國時代（公元前四七三至二二一年）。初期百年間，發生了政治社會的大革命。貴族階級被推翻，國君獨裁，最後都正式否認天子的地位，各自稱王。戰事日愈激烈，全民平等之後，各國都行徵兵制。軍隊的數目擴大，戰事的性質愈加殘忍，在戰場上獎勵戮殺，對降卒與俘虜也時常加以不人道的大批屠殺，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是最慘的此種事例。許多古代的文獻，有歷史價值的建築，恐怕都毀於此時的大戰中。秦國已開始焚毀當政者所不贊同的書籍，別國有否同樣的情事，可惜史籍失載。思想曾經盛極一時。楊墨莊孟，諸子百家爭鳴當世。中期以下，陰陽五行與神仙的信仰興起，是文化開始退步的明證。思想趨於派別化，成了後世所謂六家。最後雜家出現，呂氏春秋象徵先秦思想的總結束。

中國的大一統時代，是秦，西漢，新，與東漢中興的三百年（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八

八年）。外表甚爲輝煌，武功極盛，秦皇漢武奠定了二千年來中國疆域的規模，東北吞朝鮮，西北通西域，南達安南，西南併滇。天下太平，民生安樂，文景，宣元，明章之世尤爲後世所稱道。但徵兵的制度到漢武帝時已不能維持，武帝的武功是靠募兵，囚犯兵，與外族兵完成的；眞正的徵兵，反處次要的地位。東漢中興，對外作戰時已到了幾乎只有胡兵可用的地步。獨立的思想消滅，先秦的思想學術直能明瞭的人可說無有。泛濫無歸的經學訓詁是當時學界唯一可能的工作。秦始皇大規模的焚書坑儒，必非文化退步的主因，只是時代作風與文化退步的一種自然表現而已。一種消極的宗教精神大盛，陰陽五行，黃老神仙，宗教化的儒學，與東漢初傳入的佛教，是當世的主要精神食糧。

東漢中興過去之後，（公元八九年以下），大漢帝國漸趨破裂，古代文化漸趨滅亡。接踵而起的內亂或邊患、羌亂、黨錮、黃巾賊、十常侍之亂、董卓之亂、使帝國的機構全部瓦解。三國的羣雄割據與西晉的粉飾太平，都不能挽回已去的大勢。最後五胡亂華，中原淪陷，中國面對全部覆亡的嚴重危機！

（乙）第二週與未來

中國發展到五胡亂華時，若按人類史的通例，可說已到滅亡時期。當時中國也確有滅亡的危險。但中國當亡不亡，經過幾百年的醞釀後，竟又創出一個新的文化，可稱為第二週的中國文化。

在政治上並無新的進展，大致只能墨守秦漢所定下的規模，但在思想文藝上，卻各代都有新的活動，並且可與第一週的文化相比。為清楚起見，可列表比較如下：

時代＼週	第一週	
宗教時代	殷商西周（前一三〇〇至七七一年）	殷墟宗教　周代宗教
哲學時代	春秋時代（前七七〇至四七三年）	鄧析　楚狂接與　孔子
哲學派別化與開始退步時代	戰國時代（前四七三至二二一年）	六家
哲學消滅與學術化時代	秦漢與東漢中興（前二二一至元八八年）	經學訓詁
文化破裂時代	東漢末至五胡亂華（元八九至三八三年）	思想學術併衰　佛教之輸入

第二週
南北朝隋唐五代（元三八三至九六〇年）佛教之大盛
宋代（元九六〇至一二七九年）五子 陸象山
元明（一二七九至一五二八年）程朱派 陸王派
晚明盛清（元一五二八至一八三九年）漢學考證
清末以下（元一八三九以下）思想學術併衰 西洋文化東漸

表中所列各項，可以自解，無須再加贅述。講到目前，我們這處在第二週末期的當代中國人士，一方面要對歐美世界的實現，一方面要覺察中國文化的實現，纔能明瞭我們今日所達的階段與明日可走的途程。我們若能不自矜，也不自餒，平心靜氣的觀察現局，大概對今日的中國以及與世界的關係，可得如下的幾種認識：

（一）西洋世界今日正處戰國的中間階段。今日的大戰雖然已夠驚人，將來的戰爭恐怕只有更加酷烈，其程度，規模與情景必有吾人所不能想像的。

（二）中國文化的第二週誠然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蹟，但現在已發展到末期，它的前途是結束舊的局面，創造新的世界，實現一個第三週的中國文化。過去的文化為何一定都要

毀滅，我們不知道。中國爲何能夠獨存，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强爲解釋，雖不太難，但目前可撇開不談。若勉强作一個比喻，我們可說文化如花，其他的文化都是草本，花一度開放，即告凋死；中國似爲木本花，今年開放，明年可再重開，若善自培植，可以無限的延長生命。第二週的文化雖在人類史上已爲例外，但既有第二週，也就可有第三週。

（三）但由實力言，今日的世界是一個歐美重心的世界，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所以我們不能完全擺脫歐美的影響與歐美的勢力而獨創自已滿意的新世界與文化。此後日愈慘酷的戰爭中，任何一次中國也無完全處身局外的可能。

（四）但由文化大勢言，歐美已至開始下落的時期。目前西洋任何一種思想，主義，或學的潮流，雖在中國都不免引起波動，但對我們的同化力恐將日漸降低。歐美的實力，在較近的未來我們雖仍不能藐視，但歐美思想信仰對我們的主動力或將日趨薄弱，我們對西洋文化中的一切可不至再似過去的崇拜盲從，而是自動自主的選擇學習。然而這絕不是說我們將

來可以鬆懈對於歐美的研究。盲從時可以不深知而不害事，選擇學習時非卻認真研究與徹底了解不可。我們將來需要更多更通的西洋學藝專家。

若對未來勉强擬定一個比較具體的方案，我們似乎可說：在實力方面，我們必須努力建起一個能夠獨當一面的軍事機構，將來在歐美重心的國際上我們最少可不至完全被動，而能取得動不動由我而不由人的自由。此點如果能夠作到，思想學術方面的前途就很可樂觀。只要能有相當可靠的實力，政治上可以完全自由，則在國際上自由自主的空氣中，相信我們此代與今後幾代的中華兒女必能建起第三週的中國文化！

——三一、二、四、昆明——

民族主義與二十世紀

——列國階段的形態觀——

林同濟

(一)

今天承雲南省黨部囑講「民族主義與二十世紀」，私衷感到榮幸而恐慌。抗戰發動以來，一般人士都很能夠肩負起發揮和解釋三民主義的責任，上自抗建綱領，下至報章雜誌中，直接間接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為背景的言論和主張，都可說是這種努力的成果。我今天不敢說有所發揮或解釋，只想就愚見所及，對民族主義，冒昧地作一個側面了解的嘗試。

我們知道，抗戰在中國歷史上是無疑地有劃時代的意義的。在這短短的四年當中，中國各方面均有劇烈的變化。在學術方面，論理也應該有一個新的開展。我認這個開展，事實上已有萌芽。我曉得學術界中已有靜中努力之人。只是他們力量分散，尚未能匯為主流。然而他們的趨向，已逐漸清晰，路線亦慢慢明白。我不久前所指認為「第三期學術思潮」者便是這個。

這種思潮的內容與輪廓，這裏不能詳談。但它在中國當代的思想史上的影響，必定要與時俱長的。大概言之，中國思潮，自五四以迄現在，二十二年經過了三段變遷。第一是經驗事實的階段，事實是那時期為學的目的，經驗派論是它的方法。第二、是辯證革命的階段。

革命，階段革命是目的。辯證是方法。第三、可說是文化綜合或文化統相(Cultural configurative)的階段。民族文化整體的認識與推進是目的，綜合或統相是方法。(參閱我「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一文)

抗戰是一個有力量的偉大現實，它一面賦予我們以一個建設學術的機會，一面也派定我們以一個建設學術的責任。我們愈感時代之偉大，愈感這種機會之難得，也就愈感這種責任之艱鉅。今天想試用一種文化綜合的觀點，來認識民族主義，看看民族主義在近代世界史上的意義是什麼，在目前二十世紀的形式與氣運是怎樣。

所謂文化綜合的工作，勢須由各種學問多方促成的——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其中一個重要學問卻爲歷史學。而在研究方法上曾給予歷史學以一種新的路徑，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我以爲是歷史上形態學(Morphology of history)。我們亦可名之曰歷史統相法。

歷史形態學或統相學是利用一種綜合比較方法來認識各個文化體系的「模式」或「形態

」的學問。各個文化體系的模式，有其異，亦有其同。我們研究，應於異中求同，同中求異。斯賓格勒曾應用這方法寫出他的「西方的沒落」的傑作。最近英國史豪湯貝的「歷史研究」一巨著（二十一個文化體系的研究）也是這方法的另一個應用的結果。在中國方面應用這方法而有卓著成績的，恐怕是畏友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國的兵與中國文化」一小書，國人應當注意。

（二）

用形態學或統相學來看文化，這種嘗試，爲期尙淺。方法雖可相同，結論未必一致。我個人看法是覺得一切文化似乎都經過下列三個階段：一、封建時代；二、列國時代；三、大一統時代。

封建時代是一個文化由原始狀態昇到水平綫以上的時代。在這時期中，一切文物，無論政治、經濟、宗教、社會各方面，才慢慢地顯示其獨特的形態，豐富的內容，以及高度發展

的可能性。嚴格言之，到這時期始有文化可言。就文化之「意」（精神）上看，封建時代的文化往往就是它任何文化後來整個精神的基礎。就文化之「形」說，凡是封建時代的文化，都有下列各特徵。

其表現政治方面者，則爲一種分化，分封的制度。雖然在那文化所被的區域，多半有一個名義上的「共主」，但其權力並不集中。共主的命令並不能透過各種下級的統治階層，而直接驅馭所有的民衆。

其表現在經濟方面者，則爲一種比較凝固不動的狀態。農業是這時期的經濟基礎。「采邑式」的農田經濟，限制了經濟區域的擴大，減低了交通的效率，而各自成爲自給自足的簡單單位。

其表現在社會方面者，則爲一種等級，層級的嚴密區分。人們的身份各自依附於若祖若父以來的等級或層級，不得踰越，不得混同。此種等級的區分雖因個別的文化體系而各有小異，然大體看之，都形成統治與被統治兩級。兩者之間，被一層截然的隔膜障礙着，無法接

物，不許互婚。

其表現在宗教方面者，則爲一種集團的，貴族的宗教。政權正式承認的宗教是統治階層所特享，平民都常常被禁止向神或上帝直接溝通。統治階層自成一集團，故宗教亦呈集體現象，成爲一種貴族的集體信仰物。封建時代統治階層的宗教，大都起源於祖先崇拜。故當時他們重要的神，往往即爲他們的祖先。神與先祖在這時代每有某種混同的意義。

總之，這時期的文化，無論其表現在任何方面者，吾人皆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必具有「上下之別」，必嚴於上下之別。「上下」兩字是這時期一切價值最重要最基本的標準。

隨着封建時代而發展的，是列國時代。在這時期中，就政治方面說：由分封到統一，由分化到集中，順應統一和集中的趨勢，國家的形態方才確立，而自然演進爲列國並峙的局面。就經濟方面說：由凝固而流通，由自給自足的采邑經濟到互通有無的商品經濟。最顯著的時代特徵，即爲商人階級的抬頭。此時工人也可以取得相當的地位，但因個別文化內在的不同，其成就亦便有高低。就社會方面說：由差別到平等，由等級到混同。維持等級和身份的

種種特權逐漸減少。自由和競爭的機會日益增多。就宗教方面說：由貴族到平等，由特殊到普遍，由集體到個人。個人可以不經僧侶而直接向神或上帝契合，通意，其結果則爲信仰自由。

總結一句：列國時代一切價值的基礎，不在於「上下之別」，乃在於「內外之分」。上下之別雖不完全泯滅，但是降到次要地位了。此時社會上的意識，不注重貴賤階級之互異，而最注重國與國間之區別。所以外戰可以消除內爭，攘外往往足以安內。在封建時代，甲國的貴族往往可以公開被迎入而爲乙國的儲統，兩個敵國的統治門閥，可以彼此婚婚，而不能與本國平民媾婚。到列國時代，則此風漸泯，而「國籍」乃成人們最基本的標誌。「內外」（國內國外）兩字乃成鑒別一切價值的標準了。

結束列國紛爭局面的，是大一統時代。在此時期中，一個龐大的帝國興起，包括整個文化區域。在政治，趨向於專制。在經濟，多少應用管制。所謂國營或官商合辦的的經濟事業，在這時期內漸漸時髦。如果封建時代經濟的象徵是農夫，列國時代經濟的象徵是商人，

大一統時代經濟的象徵可說是官僚。官僚地位的崛起，是這時期的最大事實。在一個皇帝或獨裁者的專制下，社會上一切人皆有搖身一變而爲官僚之可能，之希望。路徑有二：或是遵循一種具有客觀標準的考試制度，或是憑借其在社會上攫得的一種特殊勢力與關係。也就是說，一個平民可依據自己的「勢力」或「能力」而取得統治或準統治的地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與封建時代的世襲世業制度不同。大一統時代的社會，可說是獨夫專制下的大衆平等式。至於宗教方面，則表現出一種頹萎的傾向。表面上，官家多要製造一種膜拜皇帝的宗教。實際上，民間已漸失去堅貞單純的信心。各種神秘猥褻的雜教混聚相揉，而產生一種迷信的綜合教。兩漢以後的中國道教，便是此類。

此時期內一切價值的基礎，在清平隆盛時或勉强可以維持前兩期形式之一部，但其大勢所趨，往往只是「勢力判定一切」私人的勢力決定一切，無儼然的上下之別，也無截然的內外之分了。

上述封建，列國，大一統三個時代，是人類史上各個文化體系均有的三階段。中國如此

，希臘羅馬如此。我們細看湯貝所研究的二十餘個文化體系，竟都如此！

（三）

現在我們要問的：兩百年來推動全世界發展的西洋文化是怎樣呢？我們中國人應當堅決相信我們將來可以創造一個新的文化，成為世界主要的動力。我們應當具有這種決心和抱負。同時在今日的現狀下，西洋文化，都是世界的主流。這點無須否認，也不宜否認。惟其如此，在今日而談任何問題，必不容離開西洋文化所表現的一切問題而推演而討論。

第一步，我們先要認識西洋文化的「形態」。

以西洋文化而言，十四世紀以前為它的封建時代。十四紀以後，即從文藝復興以至現在，為它的列國時代，此後西洋文化會不會走入大一統階段呢？換句話說：此後西洋文化是否可以不走歷史上其他各體系的文化所曾已經過的路線呢？我們此刻暫不論。根據我們上列所

舉的歷史形態，我們却可以認定，目前西洋文化已演到它的列國階段的高峯。大家曉得中國文化內的列國階段，曾經我們的歷史家分爲春秋戰國前後兩期，如果應用這兩個名詞到西洋文化上頭，我們可以如此說：文藝復興至法國革命是西洋文化的春秋的時期，法國革命以至現在，便是西洋文化的戰國時期了。春秋與戰國，雖然同屬於列國階段，但彼此不同之處頗多。最重要的：春秋時代各方面都保留着封建時代的貴士遺風，戰國時代則在戰的需求與影響下，一切貴士遺風掃蕩殆盡。關於這點，我們這裏也不能多談，只好另日細論。

認清了西洋文化目前已走入戰國時代，走入它的列國階段的高峯，我們便可以再進一步來討論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即英文Nationalism。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政治主張。按前者看去，民族主義是：一羣人們受了地理歷史及其他種種的環境作用，感覺他們彼此間雖然分別言之，利害難免參差，但從大處着想，却有一種生命上心靈上不可分離的共同根據，於是產生一種渴求，願望，在政治上要組成一個完整的單位，內在要統一，外在要獨立。凡是一羣人有了

這種感覺和渴求，我們便可以說在這羣人們中發生了民族主義的社會現象。承認這種現象是合理的，是「應當」的，並且須設法培植、增進、加强、使它那種感覺和渴求完全實現的，——這便是把民族主義變爲一種政治主張。

在歷史的歷程上看，民族主義的現象，與民族主義的主張，有不能分開的相輔相成的關係，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說，便是根據中國已萌芽的民族意識之「現象」而加强提倡出來的一種「主張」，同時他這種主張在過去三四十年中也就發生了莫大的影響，增强了中國的民族意識。三民主義之中到目前爲止，成績最著的，要算民族主義了。

但我們今天所要說明的，還是一個歷史形態問題。

原來妙得很，民族主義無論其爲一種現象，還是一種主張，乃都是任何文化體系發展到列國時代所多少必有的東西。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曾有過，希臘的波利斯(Polis)分立時代也有過。西洋文化，正在經歷它的列國時代中，所以也必有它的民族主義之產生。西洋文化的特點，並不在盡有民族主義(像一般歷史政論家所說)，乃在它把民族主義，事實上、理

論上、都發揮得特別堅强而顯著。

這本是西洋文化的特點：在許多方面的表現，它都比過去一切文化，强烈得多，熱鬧得多，澈底得多。理由呢？憑你說吧，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本來一切歷史上的大事情，不是所謂單向路線的因果律(One-way Causality)所能解釋的。一個大事情，大史實的產生，都是種種色色大大小小的現象，在不斷的互相影響互相推蕩中，擁將出來的統相我們只能看到其如此，不知其所以然。不過人們的理智總不肯放休，總想設法說個「所以然」，人們這種「求其因果」的慾望，也是必需，當有的。同時我却也覺得史棻蒙森說得對：在偉大的面前，只有靜默！必不得已，也許斯賓格勒的解釋可以塞責：（其實是不成其爲解釋的。）西洋文化比姻具有一種浮士德精神，所以它所演出的戲齣比人家總强烈，總澈底。

話轉回本題來，民族主義是任何文化行到列國時代的產品。西洋文化的列國時代在文藝復興時開始，民族主義在那時也老早就開始了。五六百年來的歷史，是緊看着這個主義步步開展，步步演進。中山先生如炬的眼光，看到這點。在國人半醉半夢的時辰，揭出民族主義

，作爲開宗明義第一章，這是他把握着歷史，把握着時代精神的中心。

民族主義應當放在第一條的。我們說過了，列國時代，一切價值，建在「內外」兩字上。內外之分，就是以民族（或國家）爲準的。把民族主義放在第一條，我想中山先生是有其深意在的，他要我們認清民族主義是一切的前提，一切的一切都應當在民族主義範疇內發揮其作用：民族主義是爲民族的，民生主義也是爲民族的。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的一個大不同點，我想也許就在這裏：前者要超民族主義而談經濟平等，後者卻是隨着開宗明義第一聲之民族主義而順流延長的。廣泛一點看，把民生主義當作一種「民族的共產主義」也無不可。民生主義究竟是不主張蔑視民族的「內外」之分的。

（四）

爲什麼一個文化發展到它的列國時代會有民族主義的現象與主張發生呢？

我的解釋如下：

民族主義之原始的雛形根據，本來是一種「種族觀念」。這種種族觀念在封建時期就存在了。不過那時期的種族觀念，和其他一切觀念一樣，其分佈的形態是有「上下之別」的。「國」與「國」間（如果可用這字的話）的統治階級，卽貴族如公侯卿大夫等，倒覺得彼此血統相同或氣味相通，而對本國內被統治階級的庶民奴隸反感是鴻溝相隔。到了列國時代，貴賤的階級意識逐漸掃除，「上下別」的種族觀念便逐漸變爲「內外分」的種族觀念。也就是說，種族觀念由「身份」的根據轉移到多少是「地域」的根據。在一個地域內的人，不分上下，都覺得彼此是同一來源，形成整個種族，與其他地域的人羣有別——這便是民族主義的開始的萌芽。

然而後來民族主義所以成爲一種富有自覺性，富有組織性的高度現象者，乃是因爲列國時代都有兩個偉大的潮流。高度的民族主義可說是種族觀念受了這兩個潮流直接間接的洗禮而形成的產兒。

這兩個潮流是什麽呢？一是個人意識的伸張，一是政治組織的加強。

這又是一個史歷的形態。一個文化走到它的列國時代便有這兩種潮流發生。由於個人意識的伸張運動，逐漸而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提倡，由於政治組織的强化運動，逐漸而有國家主義，國家極權的努力。這兩個運動在表面上似乎相反，實際上也往往相對。然而在另一方面說，却往往相激而相成。其相剋相成之處，本文無暇詳論。有一點可以提及者，就是在列國時代的前期中，個人意識的伸張運動較佔上峯；而在後期，則政治組織的强化運動逐成爲時代的主流。就西洋文化說，十九世紀中葉可說是兩個潮流的分界。前乎此，個人主義優越；後乎此，集體主義抬頭。

列國時代是任何文化所演出可能的花樣之最熱鬧時期。西洋文化的列國時代尤爲好劇層出。最少有六幕熱劇可供注意。而每幕的演出，都與上列所稱的兩大潮流有關，都是推動這兩大潮流的表現。

第一幕是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的一方面的意義，是人文主義的產生，提出了「人」的概念，以與中古的「神」對抗。人代替了上帝而成爲人們意識生活的中心，這是個人意識

伸張的第一步。同時，文藝復興另有一方面的意義，就是對政治的解釋由「神意」的表現，而變爲「人力」的表現。馬奇維里的「霸術」論便是這種看法的結果，與中古的聖，奧斯丁的「上帝之城」恰恰相對襯。從這時期起，政治才漸漸脫離了神的拘束，而成爲人的意志的關係，以及物的力量的關係。在文藝復興時代，韃靼霸王鐵木蘭——人力的象徵——在歐洲人腦筋裏所引起的仰慕之忱，竟可與上帝爭衡。反叛上帝的普羅修米大士。偷天火以賚人間，尤爲文藝詩歌的題材。文藝復興在這點上說，乃是政治解放，把政治脫離宗教倫理而放在政治的本位上來發展來鑒賞。也就是政治組織強化的第一步。

第二幕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意義，自然是把個人從教會裏解放出來，使一切人在神的面前一律平等，一切人多少都可以直接與上帝契合，不須由教會爲媒介。由這方面看，馬丁。路德以及他的繼起人的努力，都代表一種個人意識伸張的運動。同時，中世紀羅馬教會所管轄的「世俗」事項，現在一一劃歸於各地域的封君或國王，中世紀教會所佔有的財產和土地，現在也慢慢剝削到各國王的手中。宗教慢慢成爲人們純粹內心生活的趨勢。因此，所

謂「政教分權」，實際上乃有把教權隸屬於政權的作用。政治組織日益具體，日益擴張。

第三幕是地理發現運動。地理發現富裕了歐洲人的經濟情況。它使歐洲人得充分發揮其經濟力量於空前大地的大舞台之中；其最後結果則為自由貿易主義的興起。有一點堪注意的：地理發現與個人自由主義有莫大的關係。新大陸的發現，予歐洲商人以人類空前的機會，來發展商人的歷史地位與作用。這機會為其他文化內的商人所未有的。自由貿易主義是商人所以對抗國王的專制主義之工具，它實在會給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以一種強有力的支持與表現。但反而觀之，地理發現也帶來了種種政治涵義：如何駕馭土人，如何管理殖民地，如何保護並利用殖民地的資源以與他國競爭，這亦都非發明有更強大的政治機構不可，所以地理發現實促進了歐洲各國的軍國組織「帝國」組織的機緣。

（五）

第四幕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本由於科學的發達，機械的發明。科學的發達是人們求知

精神的成功，本是個性發揮的證實。由科學而機械，由機械而控制自然。人們到此乃爲自然的主人翁，上帝的驅使者。聲、光、電、化，……種種的發明，那一個不是證明人們的頭腦差不多可與上帝爭衡？科學發達，工業革命都可說是個性發達的表現，而同時也促進了個人意識的伸張。但個人「致知」與社會「致用」分不開的。個人發明所以供社會致用，科學在歷史上的意義絕不僅在「求知」，乃尤在「致用」，絕不僅在飽饜個人求眞的慾望，乃尤在使整個社會科學化、機械化、組織化、規則化。科學即組織，科學發達，政府組織也要擴大，也要加强。科學和歐洲政治的相互關係，是論史者不可或忽的大事實。

第五幕是民主主義運動。民主主義運動，狹義言之，是一個政治運動。這個政治運動，目的在求人民自己成爲國家的主人翁。用投票形式來表現各個公民的政治威力。其代表一種個人意識的伸張，彰彰明甚。但我們不可忽視：民主主義發達以後，對於政治組織的强化却也大大有幫助。「人民是國家主人翁」的觀念，提高了民衆的愛國心和責任心。在西洋歷史上，民主運動每次都提攜着愛國運動而來。尤堪注意的一個微妙事實：教育國營與全國徵兵

制——兩個贈強政治組織的大工具——便是隨着法國大革命的民主運動而出現的。原來民主運動，在事實上不只是個人主義的表現，也是集體主義的促成。這點許多形式分析派的史家每每看不到的。

最後一幕是社會主義運動。這個運動的本來意義，在把民主運動由政治推到經濟方面。必須經濟平等方可以充分發展個性，故社會主義運動本是個人意識伸張運動的引伸。但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又顯然是一種集體主義。而在事實上的表現，凡屬於社會主義性的國家，無論是蘇聯或是其他，其政治組織上，亦必然地呈出一種極高度的強化。不管理論家說法如何，就已有的事實表現上看，社會主義的實現，竟也就是極權國家的產生！

所以，六幕熱劇只有兩個中心母題，儘管表面上的旗幟標出了文藝，宗教、地理、科學、政治、經濟各符號，而每幕的主要作用都是伸張個人意識，加強政治組織。我已經提過了，這兩個潮流大有相尅相反之處的。個人意識的伸張，是一種離心的運動。政治組織的加強，是一種向心的工作。一是散，一是集，一是離，一是合。如何可以把它調劑協合起來呢？

這確是近代西洋文化中的一個實際社會重建問題，也是一個心靈重建問題。

爲了這兩個思潮的矛盾產生了西洋無數人靈魂上的煩悶與不安。在這裏，民族主義確有它的作用。一個人感覺自我特立獨在，握有獨具的價值，不與人同，也不要與人同——這是個人意識所產生所培植的觀念。但他同時又要否認自我，承認自我只不過爲一個「大我」的零星斷片，不能離大我而獨立，必當附大我而發揮其作用，——這是政治組織加强化所必須根據的基本觀念。民族主義頗能夠在這兩個矛盾觀念之間，搭起來一座橋梁，使之融合於一體。民族主義提出它那種族一概念，引喚那地域內每一個人都覺得他的特立的自我原來都是出自一個公共的祖先，化自一個同源的血統（事實上是否如此，是不涉重要的問題。）每個人儘管還是每個人，但同時也自願承認爲那個同源的集體之一部——就是民族。而所謂政治組織的單位，並不是自外突來的異體，仍卽是他所自出的民族。於是個人意識的伸張相安，越是這兩個潮流發達，越需要民族主義做調人。在西洋文化裏，民族主義之所以比任何文化都强烈鮮明者，這點或許是個大理由。

反而觀之，民族主義本身，受過了這兩個潮流的洗禮，也就不再是列國初期的那種模糊不確的原始種族觀念。它受了個人主義的刺激，成爲一種富於自覺性自動性的東西，因爲它乃由每個人經過自覺工夫而自動接受的，它受了政治組織加强化的影響，成爲一種富於組織，實力性的東西，因爲它不僅是一個概念，乃擁有一個社會制度以爲其執行意志的機關的。列國時代的「民族主義」所以大異於封建時代的「民族意識」者，就在這裏。

（六）

我上面提過了，雖然列國時代一行開始，個人主義潮流與政治組織潮流便並肩發展，但到了後來愈向前走，政治組織潮流愈形優越。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西洋文化可說是已經走到了這種情境。那時候，社會主義的抬頭，德意兩國的統一都可說是這種情境的號箭。

社會主義運動這一齣劇，在一般人看去，都認爲是一種工人解放運動，一種階級革命的運動。誠然，誠然，誠然。但更重要的意義——就是它在歷史上的中心作用——在我看去，恐怕將

在於政治組織的極端加強化。歷史上許多事情，在起初推動者的用意是一回事，到了後來實際上的結果或作用另是一回事。社會主義的開始固然是一種階級運動，實際上的結果只怕還是促進極權國家——由蘇聯以至德意——的誕生！究竟列國時代的基本價値與形式或是內外之分，不是上下之別。所以「上下別」的階級解放運動都終要有意無意變成爲「內外分」的國家極權運動。階級解放終只能在國家的界限內發展而不能打破國界而成爲國際的整個運動。應該不應該，不在話下。我們所指出的，是客觀歷史範疇的事實。

極權國家的誕生（可能即是下一幕戲劇的鳴鑼。伴着極權國家而演出的熱劇，大約就是所謂「大戰」（Grveatwar）之一物了。「國家要極權，爲的是對外好作戰。」李伯曼Lippman這看法是對的。極權國家就是大戰的另一面。

除非當代人類能用旋天轉地的意思，突破這歷史的盡頭，這可能就是二十世紀的意義了：二十世紀大可能要教未來的歷史家叫做「大戰的世紀」。韓非子當日所賜予其所目擊的中國戰國時代的名字很可以移用到現時的西洋戰國時代——就是「大爭之世」。大爭之世要發

現許多次的大戰爭。上次歐戰後，歷史家把它叫做the great war，好像是唯一的大戰，不會再有了。現在却撲來了第二次大戰 Graetwar。第二次大戰後可免有第三次大戰嗎？我希望可免，我希望這次戰後，不會再有大戰來臨，我希望這次戰後，我們聯合國家可以想出法子，建立一個永久和平的世界。但——事體是不易辦的，整個的歷史氣運都沈重地迫向「大爭」一路上走，要於這番戰後，翻手轉「大爭」為「大同」，除非人類能顯出空前未有的智慧，決心，毅力，前途未許輕易樂觀的。政治家的職務，在充分認清困難後，仍求努力。萬不當否認困難的存在，而高歌「世界民族解放」的必來，億萬斯年和平的在握。最近美國斯帕克孟教授發表一書，稱此次戰後世界仍要恢復到「勢力均衡」的局面，「美國也許需要得英國的同意，利用日本與德國以均衡中國與蘇聯之勢力。」他的看法是根據於世界「地略」而下這些現實式的結論。他的見解諒不能得美國朝野大多數人士的贊同，但我們一方面深信英美同盟國確守大西洋憲章的精誠，一方面却不能不注意其他發展的可能性以至或然性。

換句話說，按歷史的氣運看，我們的世代正是「大爭之世」的一部。如果我們要於這次

的「大爭」後建立「永久和平」第一個條件是不容錯認永久和平當然來臨。永久和平需要永久努力的代價！

（六）

大爭之世，其所以爲，「大」者在那裏呢？曰，爭以全體。曰，爭在天下。也就是說，戰的方法，要動員全民族的人力、財力、智力、文化力。戰的歸宿，有意無意，都在一種世界性的權力的形成。

大爭之世乃任何文化走到列國後期所終要走到之世。它與民族主義所產生的關係可說是一方面代表了民族主義在若干規模因素中所蘊蓄而成的最高峯，一方面也表示了由於這最高峯而產生的相反傾向。因爲，一個世界性的權力形成之日，也就是民族主義消亡之日。天下定於一，民族主義的多元概念勢當取消。

然而細察當前的形勢，西洋文化還未到「定於一」的時辰。這次大戰，不論那一方勝利

，其所帶來的結果，將不是世界的統一，而乃是兩三個超級國家的誕生。這兩三個超級國家可是一類壓倒勢的「大力國」Great powers，實際上決定人類命運的前途。配合而來的，也必有一類「大力國主義」，從理論上賦予這兩三個大力國以公認的地位與特權。

問題不在「大力國主義」的成立，因爲它的成立恐怕是必然的。問題在這次戰後這大力國主義究竟是取希特拉東條的強暴形式，抑還是一種開明領導的「齊桓公」作風——我們尙可叫爲羅斯福作風？

民族主義的前途恐怕就在這兩類型的大力國主義下取得決定。前之類型勝利，民族主義將逐漸汨沒。後之類型勝利，民族主義或可取得一種新方式與大力國主義並行而並存。

這是西洋民族主義的關頭，而也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關鍵。

三十一年八月講於昆明。

中外的春秋時代

雷海宗

（一）

春秋時代，在任何高等文化的發展上，都可說是最美滿的階級。它的背景是封建，它的前途是戰國。它仍保有封建時代的俠義與禮數，但已磨掉封建的混亂與不安；它已具有戰國時代的齊整與秩序，但尚未染有戰國的緊張與慘酷。人世間並沒有完全合乎理想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形態，但在人力可能達到的境界中，春秋時代可說是與此種理想最為相近的。

春秋背景的封建時代，是文化發展上的第一個大階段。由制度方面言，封建時代有三種特徵。第一，政治的主權是分化的。在整個的文化區域之上，有一個最高的政治元首，稱王（如中國的殷周），或稱皇帝（如歐西的所謂中古時代）。但這個元首並不能統治天下的土地與人民，雖然大家在理論上或者承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所

直轄的，只有天下土地一小部份的王畿，并且在王畿之內，也有許多卿大夫的采邑維持半獨立的狀態。至於天下大部的土地，都分封給許多諸侯，諸侯實際各自爲政，只在理論上附屬於帝王。但諸侯在封疆之內也沒有支配一切的權力，他只自留國土的一小部份，大部土地要封與許多卿大夫，分別治理。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之上，也非絕對的主人，采邑的大部又要分散於一批家臣的手中。家臣又可有再小的家臣。以此類推，在理論上，封建貴族的等級可以多至無限，政治的主權也可一層一層的分化，以至無窮。實際的人生雖然不似數學的理論，但封建政治之與「近代國家」正正相反，是非常顯明的事實。

封建時代的第二個特徵，是社會階級的法定地位。人類自有史以來，最少自新石器時代的晚期以來，階級的分別是一個永恆的事實。但大半的時期，這種階級的分別只是實際的，而不是法律所承認並且清清楚楚規定的。只有在封建時代，每個人在社會的地位，等級、業務、權利、責任，是由公認的法則所分派的。

封建時代的第三個特徵是經濟的，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產。自由買賣，最

少在理論上不可能，實際上也是不多見的。所以有的土地都是一層一層的向下分封，分封的土地就是采地。土地最後的用處，當然的食糧的生產。生產食糧是庶民農夫的責任，各級的貴族，由帝王以及極其微賤的小士族，都把他們直接支配的一部土地，分給農夫耕種。由這種農業經濟的立場看，土地稱爲井田（中國）或佃莊（歐西）。此中也有「封」的意味，絕無自由買賣的辦法，井田可說是一種授給農夫的「采」，不過在當時「封」或「采」一類的名詞只應用於貴族間的關係上，對平民不肯援用此種高尙的文字而已。

總括一句：封建時代沒有統一的國家，沒有自由流動的社會，沒有自然流通的經濟。當時的政治與文化，都以貴族爲中心。貴族漸漸由原始的狀態建起一種豪俠的精神與義氣的理想，一般的糾糾武夫漸漸爲斯文禮儀的制度所克服，成了文武兼備的君子。但在這種發育滋長的過程中，政治社會的各方面是不免混亂的，小規模的戰爭甚爲普遍，一般人的生活時常處在不安的狀態中。

封建時代，普通約有五六百年。封建的晚期，當初本不太強的帝王漸漸全成傀儡，把原

有的一點權力也大部喪失。各國內部的卿大夫以及各級的小貴族也趨於失敗。奪上御下，佔有一切利益的，是中間的一級，就是諸侯（中國）或國王（歐西）。最後他們各把封疆之內完全統一，使全體的貴族都聽他們指揮，同時他們自己卻完全脫離了天下共主的羈絆。列國的局面成立了，這就是春秋時代。

（二）

主權分化的現象，到春秋時代已不存在。整個的天下雖未統一，但列國的內部卻是主權集中的。社會中的士庶之分，在理論上仍然維持，在政治各部輔助國君的也以貴族居多。但實際平民升為貴族已非不可能，並且也不太難。在經濟方面，井田的制度也未正式推翻，但自由買賣的風氣已相當的流行。各國內部既已統一，小的紛亂當然減少到最低的限度；至此只有國際間的戰爭，而少見封建時代普遍流行的地方戰亂。真正的外交，也創始於此時。貴族的俠義精神與禮節儀式發展到最高的程度。在不與國家的利益衝突的條件之下（有時即或

小有衝突，也不要緊），他們對待國界之外的人也是盡量的有義有禮。國際的戰爭，大致仍很公開，以正面的衝突爲主，奇謀詭計是例外的情形。先要定期請戰，就是後世所謂「下戰書」，就是歐西所謂宣戰。「不宣而戰」是戰國時代的現象，春秋時代絕不如此無禮。晉楚戰於城濮，楚帥成得臣向晉請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這幾句話，說得如何的委曲婉轉！晉文公派人回答說：「寡君聞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答辭也可說與請戰辭針鋒相對。

戰爭開始之前，雙方都先排列陣勢，然後方才開戰，正如足球戲的預先安排隊形一樣。有的人甚至寧可自己吃虧，也不攻擊陣勢未就的敵人。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水，宋人已成列，楚人尚未渡水。有人勸襄公乘楚人半渡而突敵軍，宋君不肯。楚軍渡水，陣勢未成，又有人勸他利用機會，他仍拒絕。最後宋軍戰敗，襄公自己也受了傷，並且後來因傷致死。這雖是一個極端的例，但卻可代表春秋時代的俠義精神，與戰國時代惟利是圖的風氣大異其趣。

春秋時代的戰爭，死傷並不甚多，戰場之上也有許多的禮數。例如晉楚戰於邲，晉人敗

逃，楚人隨後追逐。晉軍中一輛戰車忽然停滯不動。後隨的楚軍並不利用機會去擒俘，反指教晉人如何修理軍輛，以便前進。修好之後，楚人又追，終於讓晉軍逃掉！

雖在酣戰之中，若見對方的國君，也當在環境許可的範圍內恭行臣禮。晉楚戰於鄢陵，晉將郤至三見楚王，每見必下車，免首胄而急走以示敬。楚王於戰事仍然進行之中，派人到晉軍去慰勞郤至如此不厭再三的行禮。郤至與楚使客氣了半天，使臣纔又回楚軍。在同一的戰役中，晉欒鍼看見楚令尹子重的旌旗，就派人過去送飲水，以示敬意。子重接飲之後，送晉使回軍，然後又擊鼓前進。兩次所派到對方的都是「行人」，正式的外交使臣，行人的身命在任何情形下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歐西的春秋時代，就是宗教改革與法國革命間的三個世紀，普通稱為舊制度時代。歐西人對於利益比較看重，沒有宋襄公一類的人，但封建時代的禮儀俠氣也仍然維持。例如當時凡是兩國交兵，除當然經過宣戰的手續與列陣的儀式之外，陣成之後，兩方的主帥往往要到前線會面，互示敬意，說許多的客套話，最後互請先行開火。過意不去的一方，只得先動手

，然後對方纔開始還擊。到法國革命之後，就絕不再見此種不可想像的儍事了！

除此較嚴重的戰爭場合外，一般士君子的日常生活也都以禮爲規範。不只平等的交際如此，連國君之尊，對待臣下也要從禮。例如臣見君行禮，君也要還禮；不似後世專制皇帝的呆坐不動而受臣民的伏拜。大臣若犯重罪，當然有國法去追究。但在應對之間，若小有過失，或犯了其他不太嚴重的錯誤，國君往往只當未見未聞。路易第十四世，是歐西春秋時代的典型國君。他的最高欲望，就是作整個法國甚至整個歐洲最理想的君子。有一次一位大臣當面失態，使路易幾至怒不可遏。但他仍壓抑心中的怒火，走到窗前，把手中的杖擲之戶外，回來說：「先生，我本想用杖打你的！」

英國伊利沙伯女王的名臣腓力。西德尼爵士是當時的典型君子。舉止行動，言談應動，對上對下，事君交友，一切無不中節。男子對他無不欽羨，女子見他無不欲死。他的聲名不只傳遍英國，甚至也廣播歐陸。最後他在大陸的戰場上身受重傷。臨死之際，旁邊有人遞送一瓶飲水到他口邊。他方勉强抬頭就飲，忽見不遠之處臥著一個垂死的敵人，於是就不肯飲

水，將瓶擲向敵人說：「他比我的需要還大。」一個人眞正的風格氣度，到危難臨頭時必要表現，彌留之頃尤其是絲毫假不得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指罪孽深重臨死懺悔者而言，那只是虛弱的表示，並非眞情的流露。至人臨死，並無特別「善」的需要，只是「眞」而已。世俗之見，固然可看西德尼的舉動爲一件「善」事，但那是對他人格的莫大誤解，他那行爲是超善惡的，他絕無故意行「善」的心思。與他平日的各種舉動一樣，那只是他人格自發的「看」，與弱者臨危的「善」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後代時過境遷，對前代多不能同情的了解，春秋時代的理想人格是最易被後代視爲虛造作的。當然時代任何都有僞君子，但相當大的一部份的春秋君子是眞正的默化於當代的理想中。

（三）

我們舉例比較，都限於中國與歐西，因爲這兩個文化可供比較之處特別的多，同時關於它們的春秋時代，史料也比較完備。此外唯一文獻尙屬可觀的高等文化，就是古代的希臘羅

馬。希臘文化的春秋時代，是紀元前六五〇年左右到亞歷山大崛起的三百年間。當時的歷史重心仍在希臘半島，雅典與斯巴達的爭雄是歷史的推動力，正如中國的晉楚爭盟或歐西的英法爭霸一樣。當時的希臘也有堪稱春秋式的禮制，凡讀希羅多德的歷史的人都可知道。俠義的精神，尤其是大國對大國，是很顯著的。雅典與斯巴達時斷時續的打了四十年的大戰之後，雅典一敗塗地，當時有人勸斯巴達把雅典徹底毀滅。但斯巴達堅決拒絕，認為這是一種衰瀆神明的主張。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使命，都在斯巴達俠義的一念之下，日後得有發揚的機會。

上列的一切，所表現的都是一種穩定安詳的狀態。春秋時代的確是穩定安詳的。封建時代，難免混亂；戰國時代，過度緊張。春秋時代，這兩種現象都能避免。國際之間，普通都以維持均勢為最後的目標，沒有人想要併吞天下。戰爭也都是維持均勢的戰爭，殲滅戰的觀念是戰國時代的產物。在此種比較安穩的精神之下，一切的生活就自然呈現一種優閒的儀態，由談話到戰爭，都可依禮進行。

但歷史上的任何階段，尤其是比較美滿的階段，都是不能持久的。春秋時代最多不過三百年。中國由吳越戰爭起，歐西由法國革命起，開始進入戰國。貴族階級被推翻，貴族所代表的制度與風氣也大半消滅。在最初的一百年間，中國由吳越戰爭到商鞅變法，歐西由法國革命到第一次大戰，還略微保留一點春秋時代的餘味。但那只是大風暴雨前騙人的平靜，多數的人仍沉湎於美夢未醒的境界時，慘酷的、無情的、殲滅戰、閃電戰、不宣而戰的戰爭，滅國有如摘瓜的戰爭，坑降卒四十萬的戰爭，馬其諾防軍前部被虜的戰爭，就突然間出現於徬徨無措的人類之前了。

——戰國策半月刊第十五六期合刊——

戰國時代的重演

（一）

我們必須了解時代的意義。

民族的命運，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了解時代，猛力推進，做個時代的主人翁，便是茫無了解，即或了解而不澈底，結果乃徘徊、分歧、失機、而流為時代的犧牲品。

現時代的意義是甚麼呢？乾脆又乾脆，曰在「戰」的一個字。如果我們運用比較歷史家的眼光來占斷這個赫赫當頭的時代，我們不禁要拍案舉手而呼道：這乃是又一度「戰國時代」的來臨！

說來雖奇怪，却不是無因無緣。歷史自有歷史的邏輯，快眼可以揭發。歷史上自成體系的文化，只須有機會充分發展，不至中途被外力摧殘而夭折者，都要經過一個「戰國時期」。在我們中國，則上自吳越戰爭，下至秦始皇兼併六國，為期約二百五六十年。在希臘羅馬史，則上自腓尼基戰爭，下至凱撒時代，為期約二百年。埃及印度各體系的文化，也都各有各的戰國一段落。

歐洲文化，崛起於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之後，雖處處顯著着希臘羅馬的影響，但在整個體質上乃是獨立的體系。經過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地理發現，工業革命的各幕熱劇，乃

不可遏止地成爲現代全世界文明的動力，並且還決定了現代世界史——人類第一次眞正的「世界史」——的發展模型與方式。我們細察二百年來的世界政治，尤其是過去半世紀的天下大勢，不得不凜然承認你和我這些渺小體魄，你和我競競集湊而成的中華民族，已經置身到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當中了！我們的時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當着世界史上「大戰國時期」露骨表演的日子。這段熱劇，在十六、十七、十八三世紀早已漸呈雛形，就好像我們的「春秋時代」在許多方面也都是「戰國七雄」的先驅一般。但眞正開幕之期，似可以拿破崙戰爭爲準：充量的揭發，大可能還要包括此後的三五百年。

（二）

戰國時代的意義，是戰的一個字，加緊地、無情地、發洩其威力，擴大其作用。

戰本來是任何時代都有的現象，並不是戰國時代的專有品。戰國時代之戰，所以大異於其他時代之戰者，有三個大趨向在。這三個大趨向，因爲了各個文化體系的內外在環境之特

殊，主觀客觀條件之差異，當然不免也有和緩與極端發展之不同，部分與充分表現之互別。却是演化的形勢以及發揮的作用，大體上都能夠綽約相等。縱觀中外古今，戰國時代之所以爲戰國時代，戰國的戰之所以爲戰國的戰者，理由都在這裏。

（一）戰爲中心。——每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偏重的中心現象。這個中心現象一方面決定了那時代的「統相」Gestalt，一方面也就說明了那時代的意義。宗教時代，信仰中心。經濟時代，企業中心。革命時代，社會改造中心。戰國時代，戰爭中心。所謂戰爭中心者，戰不但要成爲那時代最顯著最重要的事實，而且要積極地成爲一切主要的社會行動的標準。在宗教、經濟、革命各時代，戰的主要動機，多出於信仰、企業、社會改造等等事實；戰的進行，也並不積極干涉到信仰、企業、社會組織等等的主要內容。到了戰國時代，戰的威脅與需求迫切到一個程度而戰乃竟成爲一切行動的大前提。社會上一切的一切都要逐步地向戰的影子下取得存在的根據。一向所謂信仰、企業、社會改造等等大事情都要逐步地失去獨立發展的自主權；戰的威力反要加緊地、加速地、取得主動的地位，而積極決定其他一切的內容與

外表。

(二)戰成全體。——其他時代的戰，性質不免「偏面」。參戰員的數目有限，作戰物的品類不多。到了戰國時代，戰乃顯著地向著「全體化」一條路展進。全體化的形勢與程度，各體系的文化雖然各自不同；但蘊其文化內在條件的可能範圍，都一致力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這種氣象，在中國的「戰國階段」就露出相當的規模，既不是以前的封建以至春秋時代所可比，更不是以後的大一統局面下「雍穆熙和」「粉飾太平」的一套。在中國的戰國七雄中，比較最能徹底推行全體戰的，便是秦國。現代所謂全能國家如德、義、等等，都可說是「秦之續」而變本加厲。正所惡作劇的時代。一方面是投機而生，一方面還要挾時而進的。淺見者流，到了今天還要死把整個全能的組織意義，當作一種專對民主潮流而生的反動而討論，就好像乎宇宙間森羅萬象，除了維克多利亞的民主政體，便沒有更重大的事情，而一切歷史上的事態變遷都必得拱繞着民主兩字而或正或反！真迂泥極了。

這並不是看不起民主，乃是說事到今日，實在險惡到驚人的程度，就是震動全球一百多

年的民主問題也竟然落到次等地位。把佔着時代的核心的，乃是「全體戰」三字。有沒有本領隨時可作全體戰，可作「戰國之戰」，乃是任何民族的至上需求，先決條件。

因此，民主政體應有不應有，再也不是你我哲理上較長比短所能決定；真正關鍵，全看民主與全體戰的關係如何。而這個關係，也絕不是形式政論者所能先驗預斷；真正關鍵乃在乎一個民族對其所慣有的政體實際運用的活力，應變的機能之如何。民主與全體戰本不必有先天註定的衝突；在某些意義下，可說正是全體戰的一種好條件。這點將來再論。此刻所要指明的：時代意義的核心，必須先切實把握。目前的若干全能國家，儘管他們發言代表人如何解釋，在客觀的基本歷史作用看去，說是為了要民主而全能，毋寧說是要全體戰而全能——就彷彿商鞅廢井田，改稅法、抑貴族、明賞罰，目的要把秦國澈底地變成個道地的戰國時代的國家，那裏是要硜硜然拿着「反封建」來當他的大前提。

「一切為戰，一切皆戰」這是全能國家的根本歷史意義與作用。我們要知「時勢」，用不着再捧出那班實驗派的專家，請他們調查統計，來一五一十地在紙上苦作推敲。但看十數

將來全體國家跟着一個呱呱墜地，我們可以無疑地判斷天下大勢是不可遏止地走入「戰國作風」了。

（三）戰在殲滅。——這恐怕是最重要的一點。戰國的戰，最驚人的色彩在這裏；戰國時代在人類歷史上最無情的作用也在這裏。

戰有兩種：一曰取勝之戰，一曰殲滅之戰。前者的結局，最多也不過賠款割城。後者的結局，則非到敵國活力全部消滅不止。在我們國史上，春秋時代七大戰都是屬於前者。吳越戰爭，開始露出殲滅的傾向。到了戰國時代，便愈戰而愈顯出殲滅的本色。齊桓公「興滅繼絕」的半封建作風，晉文公「退避三舍」的貴士豪概，有如岳陽黃鶴一去不返了。

所以然者，春秋時代之戰，目的尚在維持國際的均勢：大國對大國，只求名義上「讓執牛耳」；大國對小國，也多半只要它「聽命」而不對它「占領」。到了戰國時代，乃有一種嶄新的慾望產生——即所謂「囊括四海，併吞八方」之心了。換言之，就是統治世界的企圖。

惟其如此，勝者對敗者的要求，絕不是割城賠款所能滿足；卽使滿足，也是暫時又暫時，不轉瞬間，「一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了。如此一次又一次，必到你全部消滅而後已。所以戰國時代之戰，其特別可怕處，倒不在戰之「多而大」，乃在取勝戰少而殲滅戰多；不在取勝戰少而殲滅戰多，乃尤在乎一切的取勝戰都是著意地爲着殲滅戰作先驅—演到最後的一階段，兩雄決鬥，一死一生，而獨霸獨尊的「世界大帝國」告成。我們古代的國史如此。希臘羅馬史也是如此。目前以歐洲文化爲基礎的世界史，它此後的發展，是否可以獨成例外呢？這只有讓時間供答案。目前的事實，是殲滅戰已開始展開。

(三)

一個文化，演到某階段而便有戰國時代的來臨，並不是偶然之事，也不是神祕天工。物質條件，精神條件發展到相當程度，各區域，各民族間的接觸也就日緊，互倚賴，互磨擦的情節也就日多。在那相吸相抵的矛盾境界中，較大的政治組織成爲了邏輯的必需。併吞的慾

望就在這裏產生。由慾望而企圖，由企圖而行動，於是戰乃不可免。戰到了相當尖銳化，戰國時代遂岸然出現於人間！

用戰的方式來解決民族間，國家間的各種問題，論理是「不道德」，也「不經濟」的。在這一點上，我們「仁義派」的孟子與「功利派」的墨子之反戰論，與現各國思想家的和平主義，根本原無二致。無奈理論自理論，事實與事實。向來理論家和平呼聲漲得最高之時，也正是戰國局面急轉直下之頃。好像戰國時代的國家每每脫不了戰國時代的氣質的。它固然也想平心靜氣來「解決」國與國間的各種實利問題，但——它更想要逞力制勝，取得獨霸獨尊的地位。道地的戰國靈魂乃竟有一種「純政治」以至「純武力」的傾向，充滿了「非道德」「非經濟」的衝動的。韓非子如炬的眼光早已抓住這點。他所說「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可算是對戰國時代精神，一針見血。斯賓格勒謂此後世界，政治第一，最近作家德拉克也高唱「經濟人沒落」的一說，都可說是「見幾」之談。戰國的氣運，彷彿定命似一般，都要向着「世界大帝國」一方向擁進；而且所採取的手段，好像也都不由自主

地要出於殲滅戰之一途。所謂和平手段，共和方式，在戰國時代，侃侃能談者總比任何時代爲多。實際推行的可能性也總比任何時代爲少。這不是說和平不「應該」，只是說戰爭是「事實」。

運用全體戰，殲滅戰，向着世界大帝國一條路無情地殺進——這是戰國時代的作風，戰國發展的邏輯。如果我們眼下展開的世界史上的戰國時代（可把它叫做「大戰國時代」）稍有以異於古代中國或希臘羅馬史上的前身的話，那恐怕就是：

（甲）古戰國之戰，還未能充分發展其全體性；今戰國之戰，可以本着空前的科學發明以及科學組織法，而百分之百地把國家的一切人力物力向着一個中心目標全體化起來。

（乙）古戰國的殲滅方法尚不免粗而淺；今戰國的殲滅方法却精密而深入得多。阬殺降卒，收兵鑄像，秦始皇的辦法也。把迦太基燒成荒墟，片瓦不留，五十萬人口所賸下的五萬殘遺，盡數賣爲奴，賣爲隸，西比歐的辦法也。今戰國的作風，則經濟榨取之外，還加上微妙的奴化教育。日本則更不看他的「準武士道」的原始殘忍性而推廣其毒化政策，從根本上

來消滅我們的種族。古今中外，方法確有精粗之別，而其爲殲滅，爲「活埋」則同！

（丙）繼承古戰國而展開的若干「世界大帝國」，其面積究竟不過全地球的一角。今戰國的魄力，如果盡量發揮，莫能阻遏，其所形成的大帝國，規模必定廣大。詳細的過程無由預測。大可能的，也許開始是一種大陸式的若干「區域霸國」的對峙，最後乃在火拚而成爲全世界的「大一統」。

莫謂這種「大狂妄」絕對沒有實現之一日。現在這個由歐洲文明擴大而成的世界文明，是充滿所謂「浮士德精神」的，是提有一種無窮的澎漲力，無窮的追求慾的。我們「中庸爲教」的中國人，也許對這種大企圖，始終難於了解，難於認眞置信。儘管我們在報章雜誌上也跟着人家大喊，指斥某國某國包藏征服天下的野心，却是許多人的腦子後頭總不肯認眞相信天地間果會有這般大狂妄，更大大懷疑這般大狂妄果會有實現的可能。然而我們這朵地星的妙處，也往往正在你我認爲「期期不可能」之中，驀地湧出一個驚人的「實現」。成吉思汗，憑着他那種遊牧社會的原始工具，還可以霹靂一聲，創出來並跨歐亞兩洲的大帝國，誰能

保這個路進了「金屬混合品時代」的二十世紀科學文明必不會有達到世界大一統之一日！技術的基礎，經濟的需求，已經開展到一個程度，竟使二三「狼子野心」的國家不由自主地在那裏躍躍試手了。客觀條件，主觀心理，已經醞釀到初步的成熟。所欠的大恐只是時間——雖然在目前還看不出誰爲六國，誰爲强秦。

這正是世界「大戰國」的初期。生於斯世，爲斯世人。我們所要關心的，尙不在三百年後天下是否「定於一」。最迫切的，我們要認淸楚自今日起，時代已經無情無地開始了「戰國式的火拚」。這個火拚，不是三年五年便可了事。它乃是代表着一個曠古「强有力」的文化在演展路程中所勢必表現的主要階段。正所謂時代的中心潮流，其來也有數百年的醞釀，其去也恐怕亦必須數百年的工夫。

（四）

兩種程序正在展開着：强國對强國的決鬥，强國對弱國的併吞。

目前歐洲戰爭是前一種程序中的一幕。它的歷史作用，和上次歐洲一般，乃是要在西歐的第一陸權國（德）與第一海權國（英）之間，決個雌雄。（法義兩國只是副角。）這種海陸權的尖鬥，在歐洲地域內早有先例。小則雅典與斯巴達，大則羅馬與迦太基，都可說是英德爭霸的前身。畢竟歐洲員幅狹小，不容兩大並立。打個分曉，好使其中一個跳出世界舞臺來，充分自由地表顯其身手。英德爭霸，正不必在這一次便得到截然的結果。也許再戰下去，德霸大陸，英霸海上，海陸權「兩極化」Polarization 的相持形勢，一時無由打破，只好暫告和平。然而如此和平終是暫的。兩國的海陸權越形「兩極化」，兩國決鬥的需要也必越形迫切。如果羅馬與迦太基的爭持，前後三大戰，為期不下一百二十年，那麼，英德戰爭也大可以時繼時續，綿延一二世紀下去。解決時期，遠近不可知；終究却必須解決。

這一點，希特勒與邱吉爾都看得清楚的：英德之間，勢不兩立，不是波斯與希臘之偶爾交鋒，乃是羅馬與迦太基的你死我活。儘管開戰之初也有一般「人道稱懷」的理想家提倡妥協，事實上的無情趨勢必要向殲滅一條路推進的——就好像羅馬當日也有那西卡一般人主張

保全迦太基的命運，而實際上羅馬兵團還終究把迦太基搗毀得片瓦不留。歷史的邏輯有時竟有這般鐵版似的。

英德兩國終必要互相殲滅，因為所爭的目的終乃在世界霸權。惟其如此，他們這次戰爭自始就是一種『世界戰爭』的性質。現代世界政治的演變，主要發動力究竟還在歐洲。英德之間，誰勝誰敗，絕不能是一個『純歐洲』的問題。戰爭延長愈久，引起的國際問題必定愈多。到了後來，『非歐洲』的列強參加混戰，也許是不可免的事實。

強國對弱國的吞併，由日本侵奪我們東北以後，有如狂風暴雨一陣陣地連捲起來。自東北四省、而阿比西尼亞、而澳大利、而阿爾比尼亞、而捷克、而波蘭、而芬蘭、……其意義都是一樣的。併吞弱國，在戰國時代，不只是一種特大凌小的表現，乃尤是強國對其他弱國爭霸的一攻勢或守勢的必要步驟與準備。先下手者為強，後着鞭者失勢。強與強間競爭愈急，「強侵弱」的戰事必愈多；而這種強侵弱的戰事尤非達到全部殲滅之一步不止的。

這次日本對我們侵略，可算是強弱的程序中最重要的一大幕。它自始就滿充了殲滅被決

心的。有一點甚特別，與一般的「強侵弱」的形勢大大不同；就是日本這次來侵，不但被侵略的國家（中國）生死在此一擧，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運也孤注在這一擲中！此所以日本對我們更非全部殲滅不可，而我們的對策，捨「抗戰到底」再沒有第二途。

殲滅戰是無和可言的。一般敗北者所稱「天下無不和之戰」，對春秋時代的取勝戰而言，勉強可通；應用到這次日本對我們的殲滅戰，便是妖言誤國。戰國式的殲滅戰，根本無和；和便全體投降，男爲臣，女爲妾！偏偏有一輩慣爲臣妾之徒，以爲天地間總有僥倖可圖，只須號泣走敵廷，三跪九叩，人家即可「放鬆」饒命。傀儡心理，文人政客鬼胎，眞賤極無聊了！

（五）

最後，讓我們提出兩三點，大家必要認淸：

（一）不能戰的國家不能生存。——戰國時代來到，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躲避殲滅戰的

嘗試。在這種情勢下，小國弱國終沒有倖存的餘地；卽是倖存，也不過我們「戰國七雄」時代的宋、魯、衞當時的大政治，毫沒有過問的資格，危坐着火山邊際，永遠戰戰兢兢，到了最後一頃刻，人家揮刃，他們只有引頸就戮而已。這乃是無情的時代，充滿了殺伐殘忍之風。却也是偉大的時代，布遍着驚人的可能。惟其無情，所以偉大。惟其偉大，所以無情。人類的火運所趨，竟已借手於日本的蠻橫行爲來追着我們中國人作最後的決定——不能偉大，便是滅亡。我們更不得再抱經中庸情態，泰然撚鬚，高唱那不强不弱不文不武的偷懶國家的生涯！

（二）左右傾各字樣，意義全消。——左傾，右傾兩名詞，到今日原來已成爲過時的花樣。在戰國作風未到露骨表演的時辰，國家內部的各社層，各階級，還可以有爾詐我虞，相傾相軋的閒工夫，鬧機會。所謂左傾右傾各字樣有他們的現實背景，也有他們的社會作用。到了今天，世界大政治的演變乃早已把這兩字樣當日的涵義，根本取消。而微妙地翻手一拍，轉變成國際縱橫俾闔的一種純工具！用舊日的眼光來看，目前名國中，最左的當然是蘇聯

，最右的當然納粹德國；然而把這兩國的政治經濟制度平心相較，却比其他任何國都近似得多。名義上，爲國際策略的方便起見，彼此仍可自命爲左，自命爲右；實際上整個世界的中心潮流，迫於時勢的需求，只能有朝着一個方向推進的——就是如何建設道地的「戰國式」的國家，如何把整個國家的力量，組織到最高度的效率以應付戰國時代勢必降臨，勢已降臨的殲滅戰，獨霸戰。叫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好，叫做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也好，甚至和緩其詞，叫做代議會全能主義以及羅斯福新政策也好，根本的動向却都是「殊途同歸」，實際的結果我看都不外是「國產主義」的完成。完成的速度與形式，因爲了外在環境與內在傳統之不同，不免各國各異；但完成的必然愈演展必要愈顯明。

因此，十年來滿耳哦哦的政論，苦把意識形態的對壘——民治對全能，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等等——來硜硜然解釋國際的合縱連橫，根本上就等於捕風與捉影。前期的意識，態再也吻合不了現實的事實。如果有一些國家依舊應用着那些老名詞，那也是完全把他們當做戰國作戰的工具。合用則高唱高捧，不合用則如屣棄捐。如果他日時移事遷，棄捐的仍可再用

•你和我若還把這一套認真看待，那就未免「太書生」了。

（三）中國文化的發展，早已踏過了它的戰國階段而悠悠度過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統」的意識生活。我們中國人的一般思想立場，無形中已滲透了所謂「大同」局面下的「緩帶輕裘」「雍雍熙熙」的懶散態度。直到今天，我們還不免時時刻刻高提着「大一統」時代的眼光來評量審定「大戰國」的種種價值與現實。從上次歐戰後之高歌「公理戰勝」，以至九一八之苦賴國聯，其思想都出於一條的路線•置身火藥庫旁，却專門喜歡和人家交換「安靜古夢」。這恐怕是我們民族性中包含的最大的危險。

大同可以爲人們最後的理想。「戰國」必須是我們入手的途徑。要取得談世界和平的資格，先栽培出能作「戰國之戰」的本領。

象徵的說法，我們須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戰國七雄」時代的意識與立場，一方面來重新策定我們內在外在的各種方針，一方面來仔細評量我們二千多年來的祖傳文化！

戰國策半月刊創刊號，二十九年四月。

外交：春秋與戰國

雷海宗

古今來所有的高等文化，於封建制度過去之後，大一統的帝國出現之前，都有五六百年的列國並立時代。各國對內統一，對外均衡，在此種的國際局面下就自然的產生了外交，眞正的外交也只限於這個文化階段。由紀元前六五〇年左右到一〇〇年左右羅馬帝國的成立，是希臘羅馬文化的列國時代。關於當時的外交，史料雖然不多，但仍值得今日研究外交史與外交術的人去發壽。印度的封建時代，普通稱爲吠陀時代，於紀元前八五〇年左右結束，由此到紀元前三二一年孔雀王朝的統一帝國成立，是印度的列國時代，只可惜這一大段的政治史與外交史已幾乎全都失傳。歐西由十六世紀初宗教改革時起，進入列國，這個階段，至今尚未結束，它的外交史與外交術仍是目前活的問題，外交業者與外交學者當然對它特別注意。中國古代的春秋戰國，前後五百五十年，也是同樣的一個列國階段，外交術甚爲發達，外交史的材料傳於後世的也不少於希臘羅馬。外交史，說來話長，但春秋戰國的外交術，雖至

今日也不顯得陳腐，頗有一談的價值。

(一)春秋時代

外交各以本國的利益為出發點，而國與國間情形複雜，不似個人的關係可以比較的開誠布公，所以任何時任何地的外交都不免有欺詐的成分。但一般講來，春秋時代的外交，尚相當的坦白，欺詐的事例並不太多。外交注重辭令。外交的辭令，由好的方面說，是一種說話得體的藝術：不輕不重，不多不少，不倨不卑，而把自己的意思能夠澈底地表達，方為理想的外交辭令。由壞的方面言，外交辭令也可說是一種撒謊的藝術：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而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把對方完全蒙蔽，或使對方明知為欺詐而不能反駁，方為外交撒謊的上乘。

春秋時代最出名的一篇顛倒是非的外交辭令，大概要算成公十三年（紀元前五七八年）晉使呂相絕秦的那篇絕交書。書中先責七十年前秦穆公敗晉惠公於韓原的事。韓原之敗實乃

由晉自招；惠公原許割地於秦，中途變卦，纔引起戰爭。二、呂相又言晉文公報秦穆公扶立之德，曾使東方諸侯朝秦。這是絕無其事的讕言。三、又言僖公三十年鄭侵秦，晉文公曾率諸侯圍鄭。實則晉因鄭暗中與楚勾結，纔去伐鄭，與秦全不相干。四、責秦於此項戰役中，暗與鄭講和，此項是事實。五、言諸侯都怒秦單獨講和，將伐秦，而由晉文公制止。絕無其事。六、責秦穆公於晉文公死後，襲鄭滅滑，是事實。七、謂晉襄公因鄭滑之事，不得已而攻秦於殽。這雖是事實，卻全爲自解之辭。八、責秦於此後聯楚攻晉。是事實。九、說秦康公要强立晉公子雍爲晉侯，「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這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實際是晉國自動請秦把公子雍送回晉國即位，後來晉國又忽然反悔，將護送公子雍的秦軍當爲邊寇，乘其不備而加以襲擊！十、責秦此後累次侵伐晉邊。但這都是晉所自取。十一、責秦桓公攻晉。十二、責秦背河西之盟。十三、責秦聯狄和楚，以便攻晉。最後三點，都是事實。總觀這一篇外交通牒，雖非全無根據，但大體卻是顛倒是非，歪曲事實之言。這可說是古今中外一切外交辭令的通例，在春秋時代這不過是一個顯例

而已。

除口頭應對或文書來往的外交辭令外，春秋時還有一種特殊的辭令，就是賦詩。此時古詩集的種類大概很多，傳到後世的詩三百篇只是其中的一種。賦詩也是一種藝術，非經嚴格的訓練與練習不能勝任。對方賦詩，自己必須答賦，答賦必須洽當，否則必招人譏笑，有辱國家。賦詩時或賦全篇，或擇一二章，皆可隨機變。賦詩由樂工負責，外交人員不過發令指示而已。樂工一面唱歌，一面作樂，樂歌並作。太複雜的交涉，或難用賦詩的方式去進行，但除普通的外交酬酢當然用賦詩外，賦詩有時也可發生重大的具體作用。例如文公十三年（紀元前六一四年）鄭伯背晉降楚後，又欲歸服於晉，適逢魯文公由晉回魯，鄭伯在半路與魯侯相會，請他代為向晉說情，兩方的應答全以賦詩為媒介。鄭大夫子家賦小雅鴻雁篇，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遠行之勞，暗示鄭國孤弱，需要魯國哀恤，代為遠行，往晉國去關說。魯季文子答賦小雅四月篇，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這當然是表示拒絕，不願為鄭國的事再往晉一行。鄭子家又賦鄘風載馳篇之第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想求大國救助，魯季文子又答

賦小雅采薇篇之第四章，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之意，魯國過意不去，只得答應爲鄭國奔走，不敢安居。鄭伯見請求成功，於是就向魯侯下拜，表示謝意。魯侯連忙答拜還禮。這雖然是作戲，却也是富有內容的一段變相的外交辭令。

兩國絕交，當然是施展辭令的大好機會。在一般無關重要的外交場合中，辭令的潤飾也很重要。但若逢到眞正嚴重的交涉時，普通是先私下作一番非正式談商的工夫，並且大多是由次要的人物出面。待大體商定後，主角纔出臺作戲，在正式的會議中表演一套冠冕堂皇的辭令而已。襄公二十七年（紀元前五四六年）的向戌弭兵之會，是此種辦法的最好例證。弭兵會議的兩個主角是晉中軍將趙武與楚令尹子木。會場在宋的首都商丘，宋左師向戌是當然的主人。趙武雖先到會，子木却停留於陳國，不肯與趙武太早會面，以免兩大相逢，或將因摩擦過甚而演成僵局。向戌於是就成了中間的傳話人，先到陳會見子木，子木非正式的向向戌提議：「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就是說，晉的附屬小國也要朝見楚王，楚的附屬小國也要朝見晉侯，作爲晉楚兩國不再用兵爭取中原小國的條件。向戌回宋，報告趙武。趙武對

此並不反對，但另外提出齊秦兩國的問題，提議算齊爲晉的屬國，算秦爲楚的屬國，秦也要朝晉，齊也要朝楚。趙武還是故意給楚國出一個難題目去作。因爲齊國四十年前爲晉大敗，齊國曾親自朝楚，稱齊爲晉的屬國，還勉強可以說通。但晉秦是世仇，秦絕不肯低聲下氣的去朝晉。並且秦楚兩國雖然一向國交親密，秦並不附屬於楚，楚也絕不能命令秦去朝晉。向戌又往陳國傳述趙武的意見，子木不能決，遣人回國向王請示。楚王倒很乾脆決定說：「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向戌又回宋，趙武也就不再故意爲難，接受了楚王的決意。一切既定之後，趙武與楚國已經到宋的次要人物子晳先非正式地定盟，以免正式會議時有條文的爭論。至此，子木始到宋赴會。

正式會議本當順利，不意却發生了意外的問題。晉楚爭先，兩國都要主盟。前此的國際會議，或由晉召集，或由楚召集，兩大向未在國際會議中逢面。晉召會，當然晉主盟；楚召會，當然楚主盟。主盟，作主席，有兩種權利。第一、先歃盟：會議中所定的正式盟約用犧牲的血寫在竹簡上，約中要列與會各國的國名，主席的國名當然寫在第一位。第二、主席先

歃血：盟約寫定之後，主席先讀一遍，然後以盤中的牲血塗在口邊，表示這鬼神爲盟約的證人，這就是所謂歃血爲盟，意義與今日的簽字一樣。盟主之後，列國順序歃血。現在晉楚同時在場，主席的問題大感困難。晉國的代表說：「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說：「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兩方各執一詞，皆能言之成理，一羣小國都不敢發表意見，根本也不知應當如何調解，最後還是晉國的叔向提出一個妥協的辦法，就是在寫盟約時先晉後楚，歃血時先楚後晉。兩方都接受了這個提議，弭兵會議總算是順利的結束。

大國與小國的關係，難以完全平等的。盟約稱爲載書，當時有許多的載書可說是不平等的條約。但春秋時代國際還未發展到蠻不講理的階段，小國若有智膽兼備的外交家，在坫壇之上往左可以與大國抗衡。例如襄公九年(紀元前五六四年)晉與諸侯盟鄭於戲，晉卿士弱爲載書，寫道：「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國的代表子駟認爲如此的條文侮人太甚，於是趨前在載書上加寫了一條：「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方的荀偃大怒，說：「改載書！」要把鄭國後加的條文删去。鄭方的子展說：「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這句話說得非常厲害，晉國辭窮，無法可想，只有聽任載書保留前後矛盾的兩種條文。這大概是古今中外所未再有的一種奇特條約。（以上各節具見左傳。）

總觀春秋外交的各種情形，欺詐的作用雖不能免，但大體還是有規則，講道理，重禮節的國際交往周旋的一種方式。一進戰國，情形大變。國際的局面驟然緊張，外交也就隨着根本變質了。

（二）戰國時代

戰國初期的百年間，由吳越戰爭到商鞅變法，是一個大革命的時期。革命的詳細經過，

今日已不可攷，但革命的結果我們看得很清楚。各國都變成國君一人專制獨裁的國家，擴充領土變成列強的最高國策。各國都成了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想吞併鄰國，最後統一天下。戰爭之外，外交，無所不用其極的外交，也是達到此種目的的一種手段。春秋時代比較坦白的外交已不可再見，縱橫詐僞變成外交術顯著的特徵。春秋外交藝術之花的賦詩，無形消滅，可說是外交術徹底革命的象徵。賦詩何時停止，難以稽考。左傳中最後一次的賦詩，在昭公二十五年（紀元前五一七年），正當孔子三十五歲左右的時候。但這不是爲此後不再賦詩之證，最多只能表明賦詩之事日漸稀少。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篇）所謂「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就是指出使外國時賦詩而言，可見當孔子時賦詩仍相當普遍。孔子教授弟子學詩的一個重要目的，也就是希望他們將來從政時，若出使四方，能夠專對。賦詩的傳統，大概就在戰國初期百年大亂的時期消滅。賦詩之事，象徵春秋時代穩定安詳優閒自在的文化精神與國際空氣。此種精神與空氣進到戰國後已不復存在，無人再有閒情逸緻去雍容賦詩。

戰國策與史記所紀載的縱橫外交，乍看之下，好似是縱橫萬端，難以揣測。但若歸納研究，就可見在隨機應變的運用之上，實有幾條原則，一切的詐僞都逃不出它們的圍範：

（一）利而忘義——絕對的信義，只能見於私人間的關係上，國際當然不可能。但戰國時代國際間信義掃地的程度則遠非春秋的士君子所能想像。例如韓齊二國曾訂軍事同盟，約定患難相助。後來秦伐韓，韓派使節往齊求援，齊王想要出兵解救時，齊臣田臣思說：「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王稱善，於是應許韓的使臣立刻出兵，而實際按兵不動。楚趙爲要維持均勢，果然自動出兵，齊國却乘着大家忙亂不堪的時機攻佔燕國，把燕國臨時滅掉。（戰國策第九齊策。）又有一次，齊秦二國强甲天下，秦約齊同時稱帝，齊爲東帝，秦爲西帝。齊國想稱帝，又怕天下各國不服，空招無趣，於是決定應許與秦同時稱帝，而先觀望不稱，待秦國稱帝之後，如果沒有不利的反響，齊國再正式自加尊號，也不遲，秦稱帝，若國際的輿論不佳，齊就始終不動，免得與秦同被惡名。後來秦國果然上當，稱帝不久就又羞答答的取消了

錯誤。這在戰國時代算是秦國外交上一個小小的失敗。（戰國策卷十一齊策四。）

齊攻宋，宋派使向楚求救，楚王滿口答應，痛快非常。宋使回國途中，面帶憂容，他的從人問他何以復命成功而不歡喜。宋使說：「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悅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楚國果然失信，聽宋爲齊所敗而不搭救。（戰國策卷三十四宋衛策。）

（三）賄賂內奸——買通敵對國家中意志薄弱，頭腦不清，或思想複雜的份子，無事時可以洩露情報，有事時可以擾亂觀聽，這是國際鉤心鬥角局面下的一種費少而效用大的陰謀手法。賄買內奸，以人類六弱點的貪慾爲起發點。秦對此點看得最清楚。秦相應秦有一次對秦王說：「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欲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無相與鬥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戰國策卷五秦策三。）這未免太小看了天下之士。不計私利而一心抗秦的人物，各國都有。但接受秦賄而出賣國家的人，的確也不算少。秦王政即位不久，出萬金，令大陰謀家頓弱

到各國出行賄，六國自將相以下都有被收買的人。（戰國策卷六秦策四。）秦國吞併天下，兵力之外，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助力。秦國賄賂策略收效最大的地方，就是齊國。齊相后勝暗中受了秦國的金玉，故意鬆弛齊國的武備，以致最後齊國在六國中成了唯一不抵抗而滅亡的國家。（戰國策卷十三齊策六。）

（三）流言反間——散布謠言蜚語，挑撥離間，拆散敵方領袖間的團結合作，也是一種失敗也無大礙，成功可收奇效的外交攻勢。燕將樂毅攻齊，下七十餘城，除莒與即墨二地外，齊國全部淪陷，齊王亦死，眞可謂國破家亡。田單守即墨，樂毅圍攻甚急。適逢燕王死，新王爲太子時卽與樂毅失和，田單乘隙使人至燕散布流言：「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懼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新王果然中計，奪了樂毅的兵權，代將的人庸懦無能，不久就把樂毅征服的齊地全部喪失了。（史記傳八十二田單列傳）

長平之戰，趙將廉頗採取高壘堅守以老敵師的策略。秦軍屢次挑撥，廉頗自計實力太弱

，應戰必然失敗，所以始終不動。趙王以及國內一般淺見者流，多認爲廉頗過於失弱，譏怨之聲四起。秦使人往趙反間說：「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括是善於紙上談兵的軍事家，名望甚高，而無眞正的本領。但在輿論失常之下，趙王竟不顧一切，撤換廉頗，使趙括代將。趙括冒然進攻，大敗，趙軍四十萬人投降，全部爲秦將白起所坑殺。（史記卷八十三白起列傳。）這個反間計，比田單所施用的還要厲害。田單的目的不過是要去掉一個勁敵，秦人此次不僅去掉一個無可奈何的廉頗，並且還請來一個幼稚可憐的趙括，以便由秦徹底的解決。歷史的教訓很少有人接受。三十年後，秦已滅韓，出兵圍趙。趙將李牧司馬尙二人善用兵。秦軍屢次失敗，遂又用反間計，賄賂趙王的寵臣，使他乘間向趙王進讒，說李牧司馬尙與秦暗中有所勾結。這是賄買內奸與流言間離雙管齊下的進攻，趙王居然聽信了讒言，殺李牧，廢司馬尙。不久趙軍大敗，趙國亦亡。（戰國策卷二十一趙策四。）

戰國末年，唯一有膽有識的抗秦人物就是魏公子信陵君，天下知名，號召力甚大，組織六國的聯軍，屢次敗秦。秦王出萬金，在魏國佈流言：「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

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此外，秦的使臣又屢次向信陵君致賀，並問登位的日期。魏王當初雖然半信半疑，最後竟被說動，奪了公子的軍權，魏以及六國的悲運從此也就注定了。（史記傳七十七信陵君列傳。）

小國間的離間得失，有時也用反間。昌他由西周逃至東周，把西周的秘密全盤托出，東周大喜，西周大怒。西周於是派人與昌他送書，並附金三十斤，說：「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西周同時又使人告東周：「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東周的守兵當然捉得西周的送書人，東周君立刻殺掉昌他。（戰國策卷一東周策）。

（四）虛僞利誘——爲達到自己的目的，以重利引誘他人，待目的達到之後，再設法把當初送人的利益收回，甚或實際的利益始終並未放手，待把握已定之後，再翻臉不認舊賬，這也是國際縱橫捭闔的一種秘訣。戰國時代最有名的利誘例證，就是張儀騙楚懷王的故事。齊楚同盟，秦頗感受威脅，遂派張儀往楚遊說，只要楚與齊絕，秦即無條件地割商於之地六百里與楚。楚懷王大喜，與齊絕交，並派人隨張儀回秦受地。張儀回國，假辭墜車，稱病不

出。待秦已確知齊楚絕交之後，張儀稱病愈上朝，告楚使說：「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臣說：「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張儀吃驚回答說：「儀固小人，安得六百里？」楚使回國，懷王大怒，伐秦，爲秦所敗，國防要地的漢中也爲秦奪去。（戰國策卷四秦策二；史記卷四十楚世家。）後來秦攻韓，怕楚干涉，派馮章使楚，應許於戰後將漢中割還楚國，楚國又二次聽信了秦的甘言。戰後，楚向秦索地，馮章自請出亡，秦於是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馮章身上，說他未得秦王同意而擅自應許楚國割地的條件。（戰國策卷四秦策二。）又有一次，秦趙合攻魏國，魏國也以割地的厚利去騙趙國，趙國也利令智昏，退去戰圍，魏國的急圍遂得解除。事過之後，魏國也把責任推到使臣身上，不肯割地。（戰國策卷二十四魏策三。）

利誘的把戲，有時可以玩得非常複雜。楚懷王的太子橫在齊爲質。懷王死，太子要回國即位。齊以楚割東方領土的所謂下東國五百里之地相要挾，否則不放太子。太子只得答應割地。回國即位，爲楚襄王，齊要取地，襄王向羣臣求計。子良說：「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

王聲，許彊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昭常說：「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景鯉說：「不可與也。雖然，楚不可以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襄王最後問愼子，愼子說，可盡用三子之計。王不悅，以爲愼子是在開玩笑。愼子解釋說：「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楚王眞就採用了這條連環妙計；子良獻地之後，昭常又去堅守不退，不久秦又爲維持均勢出兵救楚。齊國空歡喜一場，一無所得。（戰國策卷十五楚策二）

這種空頭支票的誘人詭謀，有時也會弄假成眞，非忍痛割地不可。楚魏戰，魏許秦割上洛地，請秦不要助楚。魏果然戰勝。秦向魏索地，被魏拒絕。秦於是作出與楚接近的姿態。魏怕秦楚聯合攻己，趕快把上洛之地割與秦國。（戰國策卷六秦策四。）

（五）威逼誘降——敵人戰敗而尚未失去抵抗力，或可戰而意志未決時，用甜言蜜語去鬆解他的決心，使他相信早日投降可以免除更大的痛苦，這種利用人類僥倖心理的策略，往往也可以收獲宏效。秦敗楚，楚懷王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援。秦昭王致書楚王，說願與楚王在秦楚交界處的武關相會，面談兩國間的誤會，以便言歸於好。楚懷王猶豫不決，去，怕被欺，不去，怕招致秦國更烈的進攻。最後，懷王冒險往武關去赴會，結果被秦扣留。秦要懷王割地，否則不准回國。懷王不肯一錯再錯，堅決拒絕割地，終至死在秦國。楚太子橫雖由齊回國，即位爲襄，但秦乘楚內部人心惶惶之際，猛烈進攻，大敗楚國。（史記傳四十楚世家。）

五國相繼滅亡之後，只有齊尚獨立於東方。秦威脅利誘兼施，勸齊不要作無謂內抵抗，以免生靈塗炭，只要齊王入朝，就可封與五百里之地，但齊國必須降秦。齊王建的精神已被秦克服，左右亦多胆怯或曾被秦賄買，極力勸王建西去降秦。王建入秦，齊毫無抵抗而亡國。王建被秦拘禁，餓死。（戰國策卷十三齊策六。）在戰國時代秦國的全部外交史上，滅齊

是收尾的一幕，也是最便宜的一幕：一紙招降書而滅掉一個，有名的大國，全天下從此都統一於秦。

（六）騎牆外交——以上所講的，大都是大國間互相侵襲的縱橫詐術。小國在此局面下，難以有完全自主的外交，只有兼事四鄰的大國，利用大國間的矛盾，使自己成爲國際均勢之下的一個雖小而必需的成分，小心翼翼，各方討好，或可勉強維持獨立。這可稱爲騎牆外交。滕文公向孟子所說：「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又「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正道出各小國莫可奈何的悲哀。（孟子梁惠王下。）魏伐趙，勉強宋出兵隨征。宋國進退兩難，暗中派人到趙去訴說苦衷，請趙准宋軍闖入趙境，專圍一城，以便對魏交代，同時趙亦可不致受宋的大害。魏國居然被蒙蔽，以爲宋眞正在大賣力氣助戰。趙國也甚心感宋國，認爲宋只是虛張聲勢，並非眞正仇趙。宋國兩面討好，最後「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戰國策卷三十二宋衞策）當時，宋、衞、魯、中山、西周、東周諸小國時常被大國要挾。在可能時也總是採取此種騎牆的策略，以謀

自保。

(三)後言

戰國的外交，手段要辣，居心要狠，纔有成功的希望。身處戰國而行春秋的外交，小則喪權，大則亡國。戰國的結局，在各民族中，都是全文化區的統一：印度、中國、希臘、羅馬無不如此。今日的歐美大國恐也終難逃脫歷史的命運。最辣最狠的國家，往往也是最後成功的國家。戰國時曾有人對秦下過很深刻的評斷：「秦之欲併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戰國策卷二十八韓策三。）六國中的明眼人，都知秦的野心漫無止境，非獨吞天下不可。但六國始終不能一心一德的合力抵抗秦國，最後聽各個擊破，統一宇內。世勢推移，好似有非人力所能換回的趨勢。只看細節，歷史絕不重演。但若從遠處大處着眼，歷史所能

供給的教訓，似乎又非常之多。印度的史料，過度缺乏，可以不論。但羅馬的統一地中海世界與秦的統一中國，在政策的運用與步驟的進展上，往往如出一轍。今日的歐美，表面的態勢無論如何獨特，骨子裏是否又在開始重演戰國的悲劇，這當然只有後來的人纔能斷定。但我們今日的人，若由此點觀察，對世界的大局與趨勢或者能有深入一層的了解。

大夫士與士大夫

——國史上的兩種人格型——

林同濟

（一）

三千多年的中國社會政治史，不是一句話可以寫清的。必定要一言而蔽之，則我想提出八個字：「由大夫士到士大夫」。

士大夫這名詞是秦漢以來史書上常見的字眼。幾年前中國社會史論戰中，關於士大夫性

質與作用的討論，也頗熱鬧一時。什麼是士大夫，大家心目中多少都有了一個輪廓粗具的印象。

什麼是大夫士呢？這名詞尚陌生。三年前我初次提出，今天想較詳細地對大家討論一番。

第一步要弄清楚，就是大夫士與士大夫乃是根本不同的東西，氣質不同，品格不同，在社會政治上的功用也不同。大夫士與士大夫乃代表兩種根本互異的歷史背景所產生出來的兩種根本互異的人物，兩種根本互異的人格型。論史者必先看清了他們的互異，才有希望開始了解中國的歷史。

從整個的體相上看，西周以至春秋大部份的社會政治是大夫士中心，秦漢以後的社會政治的士大夫中心，而春秋末世與戰國時期則可說轉捩捩代，過渡時代。戰國以前，沒有士大夫，戰國以後，沒有大夫士。一般史學家未能切實握住這一個基本事實，結果失掉了整部歷史的意義。

原來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由大夫士類型轉變到士大夫類型，乃我們民族文化發展路程上一切之一切的關鍵。這個轉變不僅是一種結構的更改，乃尤是一種動力的換質。隨着這個動力的換質，整個文化的精神，都改頭換目！

因此，我們在這裏討論這問題，不但是對中國文化過去的歷程求個認識，並且還可以於過去的認識中想法來控制我們文化的動力以企圖一個新未來的創造。換句話說，大夫士與士大夫一問題，實在也就是中國目前文化再造中的一個最基本問題。

（二）

要了解「大夫士」與「士大夫」涵義的不同，我想借用英文遷譯，最可一目了然。大夫士便是 Noble-knight 之意，士大夫便是 scribe-offical 之意，也就是說，大夫士是貴族武士，士大夫是文人官僚。前者是封建的層級結構的產物，後者是大一統的皇權專制下的必需。說中國三千多年的歷史是由大夫士到士大夫，也就是說它是由貴族武士型轉變到文人官僚型

。與我另在一文內所稱爲由封建階段轉到大一統階段的一說，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看法（參閱本期「形態歷史觀」）。

中國封建時代的層級結構，在一切的文化體系中，可說是最爲繁縟而嚴整：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奴隸。但是樞紐，最活躍的社會，實是大夫士（卿大夫士）。他們上承天子諸侯，下接庶民奴隸。大體說來：天子諸侯表面上雖最尊貴，實際上政權的運使多在卿大夫的手中，而卿大夫的推行政權又要靠士的技術與效命。我曾經說過了，如果天子諸侯可稱爲御臨社會，即「南面」等級，卿大夫便可稱爲執政社層，即「爲治」等級，士可稱爲行政社會，即「有司」等級。南面御臨的天子諸侯，其基本作用在充當統治的象徵。庶民奴隸的作用則在勞力而生產。眞正的支配行爲，創造動力，實出自大夫士。封建社會實即是大夫士中心的社會。

大夫士社會的特徵，縱的方面是「世承」，橫的方面是「有別」。所謂有別者，上下的社層，原則上不容逾越而必須各守其「分」。所謂世承者，這種不容逾越之「分」，由父傳

子，代代不變，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不消說，這種世承有別的制度，流弊甚多。但在民族文化初期發展的路程上，它却供奉出來一個寶貴的代價，就是「貴士傳統」或「貴士風尚」—Aristocratic Tradition 的形式。

貴士傳統或風尚可說是根據在那世承有別的事實上所逐漸產生的一種統治者的人生觀或道德感，古所謂「君子威儀」者是。它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現象，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的。但如果我們能夠充分擺脫後代士大夫類型的社會裏種種腐儒的註解論說，我們還可以在簡保存的若干事例與故事中重新產造出當日「大夫士的人格型」的輪廓：它是自成一種作風，有它的重心，有它的一貫的條理的。

最淺顯的兩點恐怕是「世業」的抱負與「守職」的恆心。因爲是世承，所以會養成世業的抱負。因爲是有別，所以會堵出守職的恆心。世業的抱負是積極的感覺：要把他們所承受的事業做得「上不辱於先人，下有啓於子孫」。大夫的目的在昭耀他們的「威德」以貫澈他們「爲治」的使命。士的目的在貢獻他們的「才能」以成就他們「所司」的事務。守職的恆

心是消極的自克，不管爲大夫爲士，只求在本分內盡其所能，不求向上面的等級躐進僭入。大夫與士乃兩隔的橫層，士不懷有取代大夫的野心，也就像大夫不懷有取代天子諸侯的野心一樣。有了這種世業與守職的念頭，大夫與士乃取得相倚相成的功效。

當然，實際上能做到這些理想的若干成分，大是問題。但封建時代的整個社會組織要迫着當時的大夫士，傾向這些理想而立身行事，則是一個很顯明的事實。在它全盛的時期，大體上也頗能達到其所意志的均衡境界。

誠然，世業與守職的觀念，後代的士大夫也都能口頭提倡，並且有時少數人也竟能親身踐行。但古代大夫士的世業與守職的感覺所以與後代期期不同者乃在他們這種感覺又直覺地根據於「榮譽」之一物。

（三）

談到榮譽，便談到大夫士的靈魂的核心了。

榮譽是標準的「貴士情緒」。在歐西中古的騎士道稱爲 Honor（榮譽），在中國古代則稱爲義。

義卽榮譽的意識。這一點，後代道學儒們已經不及了解了。秦漢以來的道學們對「義」字所下的種種婆婆媽媽式的解釋只反證出「士大夫」的頭腦終難於了解「大夫士」的心靈。義在古代大夫士的心靈上本就是不折不扣的榮譽意識。所謂榮譽意識者，卽一種極端敏銳極端强烈的自我尊敬心，把自我看作爲一個光榮聖潔之體，它的存在不容有一點汙垢來侵。汙垢的來源有二：來自外的，與來自內的。對外來的汙垢，要「決鬥」以自衛。對自作的汙垢，要「自殺」以自明。榮譽意識的後頭，必定有一個凜凜風霜的「死的決心」。最能代表這整個的感覺的，就是當日人人必帶的「劍」。義在大夫士的社會裏乃充滿了「劍的意味」的。

明白了義是榮譽，我們便可以真正明白「禮」是什麼了。禮在當日，絕不是一種送往迎來揖讓的純式的儀節，乃是榮譽意識的一種自然表示。它並不是對人的「應酬」，乃是

自尊心的流露。歐西騎士道有所謂「榮譽之規 Codeof Honor」者。禮可說是「榮譽之規」，卽「義之規」也。當然，禮的最大實際作用在維持當日社會的層級結構，但禮的基礎必定要建築在榮譽意識的上頭。脫離了榮譽意識，禮便要立刻變爲後代士大夫的「交際花樣」——入世手術」，不但有虛僞之嫌，並且缺尊嚴之概。禮失義則虛則卑，禮到此乃至失了原有的意義了。

如果禮所以表示榮譽意識，貫澈履行榮譽意識的，還有一套相當複雜豐富的立身行事的標準。我想提出四點討論一番，因爲我認這四點實是大夫士格型的中心要素。四點以外，當然還有許多概念與這四點相輔或至相觸，但這四點是主要母題，當日一切的一切是都要在這母題下發生作用，或取得存在的價值的。

我無以名之，想名之曰，「義的四大則」，卽忠、敬、勇、死。

忠是一種對上之誠。對上的關係是大夫士所以立身的最基本關係。大夫士的榮譽意識最要在忠字上取得表現，取得試驗。爲下犯上是頭等罪惡。「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大夫

士為他們的「主君」是絕對輸誠，不容貳心。

敬是一種持誠之道。我們社會上一般人對今天已曉不得敬是什麼東西了。我們對事對人，只慣於排斥笑傲。然而敬的態度實是一個極美的態度。它是自己脚根站著後再來承認對方的價值。它是尊著自己人格的位置後而公允地接受他人的人格的威嚴。敬的後頭，究竟還脫不了榮譽兩字的作用。敬的意義是自敬而敬人。用敬來與忠配合，可以把受忠者與行忠者的彼此關係的水準一齊提高。行忠者一方面看到受忠者的價值，一方面也把住自己的崗位，如此，則忠有高度，忠能持久。

勇是一種致誠之力。平常日充滿了對上之誠，但事到關頭，立刻畏却規避，此不能謂之忠。貫澈忠，要靠勇。勇是一種實現之力，有勇則一切可真實，無勇則一切盡空談。西方的貴士傳統所以特別注重勇者，緣故就在這裏。萬惡怯為首，西方人到今日還作如此觀。我們中國受了傳統腐儒的意識形態的蠱惑，往往有一種不可解的傾向，總要把勇字硬認作次等之德。這是一樁民族大憾事。我們細讀古代大夫士的行蹟，我們可以毫無疑義地判斷：勇實是

他們的一「個中心之德」，因爲他們認得清勇乃貫徹一切美德的「必需之力」！

勇自何來？曰來自死的決心。死可說是生力之志。能死便能勇。死是一切的試金石。我們上面說過了：榮譽意識之所以爲榮譽意識全靠它後面有一個死的決心。推而廣之，整個的大夫士的人格型，最後最關鍵的因素還在「死」的一個字。孔夫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反過來說，恐怕更合眞理：未知死，焉知生？整套的大夫士人格訓練都是建設在死的決心上：何時死？何地死？爲何死？如何死？

什麼是大夫士的人格型呢？我們現在可以下一個總界說：以義爲基本感覺而發揮爲忠、敬、勇、死的四位一體的中心人生觀，來貫徹他們世業的抱負，守職的恆心。它是一副「剛道的人格型。」

（四）

爲了種種不可免的原因，尤其是內在腐化的緣故，封建的層級社會，後來逐漸崩潰。到

孔子之世，它已走入末運了。再經過戰國的劇變以到於秦漢，中國的社會政治，實際上變爲大一統皇權類型，也就是「大夫士」之一物漸次變爲文人化，官僚化，而形成二千年來「士大夫」的結構了。

大一統皇權的本質，大體上可說是兆民之上有予一人，予一人之下兆民「無別」。於是官不是世其業，人人都有做官的資格，做官的機緣。官僚制度，在戰國時代已經萌芽，到秦漢時代則規模大備。在那環境下，士乃變爲做官的準備，大夫乃成爲做士的目標。功名觀念代替世業觀念，昇官念頭代替守職念頭。（參閱本冊的『士的蛻變』）

在這種瀰漫八方的「官僚風氣」上，却又加上一種「文人化」的傾向。漢武帝時代，士已與「文藻」開始結緣。經過六朝的「浮詞」的薰陶乃有隋唐科舉的出現。有了科舉，士變成文字的「雕刻匠」。以「斯文」的品質來任當帝王的官僚，皇權乃得到一個理想的合用工具了。

文人官僚就是我們所慣稱的「士大夫」。士大夫的人格型與大夫士根本差異。儘管在字

面運用上，在理想提倡上，好像也是「將毋同」，實行上士大夫另有一套的「世訓」。

這一套是什麼呢？曰「義」流產為「面子」，「禮」流產為「應酬」。「忠、敬、勇、死」的四位一體觀，巧變而為「孝、愛、智、生」的四德中心論。並不是他們不談「忠、敬、勇、死」，無奈實際應用的，另有所屬。並不是「孝，愛，智，生」非美德，只無奈到了那文人官僚的手裏，孝、愛、智、生的四德恰恰湊成一種「柔道的人格型」以適應他們在皇權專制下獵取「功名」，企圖「闊達」的大慾望！

然而在目前這個大戰國時代，我們所急急需要的是那一樣呢？柔道的人格型，抑還是剛道？士大夫的作風，抑還是大夫士？我們絕不要大夫士「風度，」的復活但我們是不是要多方設法重新培養出一種大夫士的「精神」？

——戰國副刊、三一、三、二五。

士的蛻變

——由技術到官術——

林同濟

（一）

我們一面抗戰，一面免不得要捫心探一探一個根本問題：在一個烏煙瘴氣的傳統社會中，如何而可得到一批能幹肯幹的健康份子以爲建立新國家的中心勁力？我一時的念頭，不由自主地要轉到「士」的問題的上面。

士爲四民之首，中國社會從來都作如此觀。從事實看去，士在社會各種勢力之中，好像也確佔首席。如果中國需要改造，士的歷史責任似乎是不可逃的，不當逃的。關鍵却在：我們現有的士究竟配不配來當改造的先鋒，改造的勁力？

在此千鈞一髮之頃，我們未敢自滿自瞞。要當改造的勁力，士的本身先須改造！本篇短

短論評，不過是要把「士」的一個字作一番初步又初步的史的分析。或者在追溯去程裏面，我們可以發現一點指示前途的燈火。

原來士的涵義，古今不同。今之所謂士，絕不是古之所謂士。我們一般人以及一般歷史家所含糊稱呼爲士者，二千多年間已經過了好幾次的變質。我們不容囫圇地等量齊觀。我們必須向他們那幾次的變質之中，蛻化之中，仔細地驗出歷史的意義。

（二）

討論這個題目，我們又要先提及封建時代了。

顯然，封建時代之所謂「士」，大大與現代不同。詳情不贅論。大體言之，那時代（西周以至春秋前期）的士，(一)是爵祿世襲的；(二)是有戰鬥訓練的；(三)是有專司的職業的。也就是說，封建的士是貴族的，武德的，技術的。前兩點，我們另有論列。現在且談一談第三點。

封建的士是充滿了技術意義的。這點，論史者大都忽略了。封建全盛時代的士還具有「技術」的感覺，就好像當今的士滿塗了「官術」的氣味一樣。技術者，做事之術也；官術者，做官之術也。由封建的士到當今的士，便是由技術到官術，便是由做事到做官。做事是生產，是「創造」。做官是消費，虛耗，是「反創造」。中國整個政治之所以糟糕，整個文化之所以殭化，關鍵就在這裏。始則政府人員，繼則社會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曉得做事，只曉得做官，中國歷史乃不可挽救地永離了真正「創造」「活動」時期而陷入「停滯」「苟延」狀態了！

封建社會是層級的組織：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奴隸。天子至士是統治的，庶人奴隸是被治的。在那統治層級之中，天子諸侯可稱爲御臨社層，即「南面」等級。卿大夫可稱有執政社層，即「爲治」等級。士是行政社層，即「有司」等級。有司者，有專門職務之謂也。如果當時的政權多屬於卿大夫的手裏，當時的行政事務却都是歸士執行。所以，那時代的士可說是技術社層，一種「專門做事」或「做專門事」的社層。說文稱：「士，事

也」。段注：「凡能事其事者稱士」。白虎通亦云：「士者，事也。任事之謂也」。這種說法是大有道理，大有史實根據的。

其實「士」與「事」，古字本來通用。周頌，「陟降厥士」。毛傳云：「士，事也」。鄭風，「豈無他事」。毛傳云：「事，士也」。荀子致士篇，「士其刑罰」。楊倞注云：士當爲事，行也」。蓋在古代，「士」與「事」二者乃不可分離的概念。凡士必能做事，必須做事。當時兩字通用，緣因定即在此，固不僅由音同而已。即在孟子時代，「士無事而食，不可也」的一種階級的榮譽觀念，好像還保存於社會上一部份人之間。

「士，事也」可說是技術本位時代的看法。當然，封建時代的技術，無論其種類或造詣，都不免要受當時整個文化程度的限制。但其爲當時統治層級所重視，似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禮、樂、射、御書、數、都在當時技術之列，故稱「六藝」。這六藝的概略，上自天子諸候，下至卿大夫，多少都要涉獵的。所謂「游於藝」者是。但專司之人仍是「有司」社層，即士的等級。其他如卜、筮、醫、藥、災、異、婚、喪、刑罰、土木、以及一切有關於養生

送死鬼神戰爭之事，多半都有專攻之人，專司之職的。

在那時代，一種技術（藝）的專攻（學）與專司（仕），普通都用「世承」的形式。子學藝於父，父死則子繼其業。「學而優則仕」，原初乃是此意。蓋其仕也，並不是「做官」，乃是「繼業」，乃是「做事」，「行父之事」。事字，業字可說是當日士的心目中的第一個對象。所以，「世濟其美」乃人生的最大榮譽；「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乃人生的最大恥辱。換言之，在封建時代，士、事也；仕、亦事也。和果我們要為「士的發達史」斷代取名，我以為叫封建時代為技術時代——即「藝的時代」，未始不為恰當。

（三）

孔子出世的時候，封建的階級社會已經崩潰到了相當程度。卿大夫世家的興替起伏，國與國間的侵伐兼併，都自然把士的社會擠入空前的脫節厄運。本來有固定爵祿與專司職務的，現在乃逐漸地成為社會上游離不安的份子。在這種環境中，當初世承技術社會裏的那種——

職業」人生觀陡然失去了事實的根據。如果老實者還肯甘心於簞瓢屢空，駁詰者定不免要投機謀財，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士亦難能。所謂「窮斯濫」「不義而富」的現象，無疑是當時慣見的事實了。

士的整個社會經濟以及行爲標準既然發生了這般的激變，那位栖栖一代的孔子當然不免要苦謀挽救之方。他老先生的辦法是一面企圖政權以求事實恢復「先王」的秩序，一面廣施教誨，在修身上提倡倫理的人格主義。修身立行尤其是他晚年失志後之主張。如果他自家當初都不免「三月無君，皇皇如也」，那麼，一種心理上自持自克的哲學不消說乃是時代的一般需要了。所以論語上所傳的「仁爲己任」「富貴浮雲」的論調都可說是應運而興的「精神食糧」。孔門四科，「德行」爲首，便是這種「精神化」的表現。同時呢，技術一物漸漸地被擯於「鄙事」之林。「不試故藝」之說，則又隱然要把「藝」看做君子不爲的雜耍了。

顯然，士這個字到了孔夫子那套孝悌爲本，忠恕爲方的學說裏面，已經大部分脫離了技術的涵義，而變成爲一種「道德本位」的名詞。再傳而至子思孟子乃愈道德化，愈精神化，

愈注意到所謂「正心誠意」工夫了。孔門在士的歷史上的大作用，就在這點：它趁着技術時期的末運，開創了「道德」時期——「道的時期」。

由孔門轉入戰國便是由「致道」的士轉入「游說」的士。孔子本身在許多方面看去都可說是開了游說風氣之先。却是他的游說始終充滿了道德先生的感覺。到了戰國，功利潮流隨着攻城攻國的現實而高漲。儘管孟軻一輩人還在那裏勉強維持「道德」的傳統，實際上，那時代士的中堅代表人物却在蘇秦張儀一幫的「大丈夫」。中國演講術到戰國可說是發展到頂峯，而演講的效用也表現到極點。士這個字乃漸失了道德的涵義，而取得了「詭辯」的新色調。是「說術」時期——「言的時期」

（四）

戰國時代那種「抵掌之間取得公卿之位」的運會，終究還是戰國時代的現象。那種「浪人式」的自由投機，是與秦漢以後的大一統皇權根本不能兩立的。於是「浪人式」的游說，

必須正常化而爲「賢良式」的貢舉。自漢高祖的求賢詔，醞釀到漢文帝漢武帝的策賢良，中國的貢舉制度乃雛形略具。貢舉出現，而後官僚制度開始穩定。官僚制度穩定，而後士的「官術化」乃正式揭幕。

所謂「官術化」者，不但指「想做官」而言。如果「做官」是封建時代士的世襲固有的特權（那時代用不着「想」做官），「想做官」恐怕是孔子以後凡士皆有的普遍志向。所不同者，孔子想做官，多少還受着良心上的牽制而不願「不由其道」（其實「子見南子」好像已經犯了不由道的嫌疑）。後代的士想做官，乃大都無所謂由道不由道，得官便佳——在我們歷代的那種袍笏擁擠的小朝廷中，要插上腳而得一席之官，那裏是容易的事。既得之，又患失之。既不失之，又思所以「昇」之。於是一種特別熬成的「官場手腕」，乃變爲人生處世的絕對須知。

原來官術的眞髓就在「手腕」兩個字。技術時期，重「器」與「物」（易經所謂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考工記所謂知者創物等是）。德行時期間，尚「志」與「心」（士尚志與正心

誠意等是）。說術時期，「口舌」爲要（張儀所謂舌存便有爲）。官術時期，「手腕」萬能。

投桃、報李、拍馬、捧場、此手腕也。標榜拉攏，結拜、聯襟、亦手腕也，排擠、造謠、掠功、嫁禍、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對付，如何吹牛，如何裝病，形形色色，無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態，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話，說假也，做官樣文章，寫假也。官場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場的事務，假公濟私的勾當也。一切皆做假，只有做官是眞。中國二千年來文化的結晶品，到此乃岸然出現：「滿大人（Mandarin）一物是已——滿大人者，做官大家也，蓋以手腕爲其做事的單方，以官術爲其唯一的技術者也。

官僚制度是大一統皇權下的必需條件，官術乃是這種官僚制度下的當然產品。自秦漢以至明清，大體上趨向一貫：皇權愈來愈專橫，官僚制度也愈來愈穩固，而官術當然也就愈來愈精細。不消說，每代的士，因爲其他背景的不同，也自有其側面表面的特色。兩漢的士，

多帶「孝廉」的氣味（皇權下的道德先生）。晉魏的士，尤饒「清談」的風趣（皇權下頹萎官僚的變態說術）。六朝的士，相炫以浮藻的文詞。但是在底質上，骨子裏，士的集團的官術化，加度官術化，却是不可挽回的正面潮流——雖然任何朝代都有若干例外的少數。

六朝文詞相競的風氣是士的「文人化」的開始。「文」的一個字上，皇權與官僚尋得了一個脗合脾胃的共同工具。緊根着六朝之後，隋唐便開始以詩賦進士。沿到明代而八股制度興。在這種情況下，「文」乃成爲一種法定的做官入門，一種「欽定的官術」。士的「文人化」，於另一方面看去，有它獨立的意義，於這方面看去，却可說是士的官術化中的一段湊合的支流。（參閱本册「論文人」。）

（五）

由技術到官術——這是中國「士的蛻變」的過程。了解這點，幾乎便可以了解中國的士之當前根本問題了。官術化太深，我們乃完全失去了「技術的感覺」恰巧，現代的西方文化又

偏偏是個空前發達的「技術文明」。人家的技術文明，日夜在那裏「制器創物」，我們的官術文化」却整天在那裏「作態做假」。人家不斷「做事」，我們只一味「做官」。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命運。

我們現有的士配不配來當社會改造的動力與先鋒，則只看其能否由放棄「做官傳統」始：並不是說大家莫做官，乃是說大家要拚命拿着「做事」的精神灌注到官場去。我曉得目前頗有少數在朝內「專家」與「學者」就是正在想法向這方面努力，——想法在那一向「做假作態」的窩窟裏要開始栽培一種「技術做氣」，一種「職業道德感」。這或是中國政治上微一線的光明。換句話說，如果過去蛻變的路程是由技術到官術，此後新生命的推進必須反數千年的舊道而由官術到技術！

戰國副刊、三〇、一二、二四、

官僚傳統

——皇權之花——

林同濟

（一）

隨不得所見有當否？近來愈觀察中國政治，愈覺得關鍵的關鍵，究都在「官僚傳統」四個字。關鍵不澈底改良，其他枝枝節節的改良都屬無關宏旨的。

所謂官僚傳統者，不僅指一般官吏任免黜陟的法規與夫分權列職的結構，乃尤指整個結構之運用的精神，表現的作風，以及無形中崇尚的價值，追求的目的。換句話說，我們此地對「官僚傳統」的解釋，不只是狹義地看做一種行政制度，乃要廣而大之，把它當作一種有的社會勢來研究；當作一種動的文化現象而從而分析它在整個國史演化上的作用與反作用。狹義的中國官僚制度，近年來已有了一二位學者開始編述。廣義的探討，尚無其人。我相

信如果我們卽行下手把這問題從多方面窮究其然與其所以然，我們對於政治清明，民族復興一問題，必定可以得個基本的認識，以至中肯的答案。

（二）

官僚制度，作一種行政結構解，並不是中國的專有品，從形態歷史學看去，任何高級文化，從封建階級段走到列國階段，遲早產生官僚制度。封建階段照例是世族政治，列國階段必定是漸演出官僚政治。

世族政治是統治的事業由比較固定的少數家族，憑藉其特有的「身份」來實行壟斷，世世相傳，原則上不容他人染指。我國西周時代，「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卽是此例。官僚政治，適得其反，除元首之位多半保留世襲原則外，人人都有資格「做官」。事實上推行程度如何姑且不論，至少理論上只須透過一種「才能」為準的遴選手續，不管「身份」如何，人人都可以彈冠登庸，辦理大大小小的統治事務，兩者相較，官僚政治多少接收些一

平等」的觀念，「賢賢」的標準，殊未可以厚非，而在當時世族消滅，社會情形複雜的場合下，除了借手於官僚，實亦無由以「為治」。官僚是列國階段的必需！

不但列國階段而已。縱觀歷史上一切古文化，由列國踏入大一統階段，官僚的勢力只有逐日增高，與時俱長。這又是一個極饒趣味的歷史的形態：官僚制度的充分成熟，照例多在列國後期，但論到結構的堂皇，地位的鞏固，威望的崇高，乃多是大一統以後的現象。從這角度看，大一統階段可說是道地的官僚階段，列國階段只可算為轉捩時期。

觀此，則中國官僚制度的發展史可知其概了：萌芽於春秋末葉，成熟於戰國時代，而大成大定於秦漢年時。由秦漢發展到明清，便可說是登峯造極，盡輝煌威重的奇觀了。秦漢以後二千年間，朝代可換，江山可合可分，而官僚勢力只一帆風順，愈駛愈高。

在今日而為官僚氣運瞻前顧後，有一些問題不免要油然湧到目前：此後官僚在中國社會與政治上的地位，其消長將如何？其對國運民生的影響，好壞又如何？此中因素複雜，不是一言可了。我們在這裏只願肯定如此說：（一）看世界各國五十年來的發展以及中國最近的

趨勢，官僚制度不但是社會的必需，而且它的作用將要加強加大。（二）我們的問題不是要取消官僚制度，乃是要改良我們一向的官僚制度。機構要改良，而傳統的改良尤爲關鍵。機構是形式，傳統乃是活用機構的精神與作風，駕馭機構的價值與目的。傳統不改良，則機構可千百改而終等於不改：傳統原來有同化機構的魔力！

（三）

中國的官僚傳統究竟是怎樣呢？在這裏我們又須認識一個歷史形態的事實。

原來由列國階段轉入大一統階段，官僚機構與作用，「順勢」而擴大，而官僚傳統却漸露出一種基本的「變質」，終使大一統階段的官僚與列國階段的官僚逕渭分流而積成兩種截然判別的類型。我無以名之，想名之曰：外向型與內向型。

列國階段的官僚傳統，它的主宰母題是外向的。在那階段，列國壁壘森嚴，環立虎視，爭空間，爭時間，爭光榮，爭存在，勝負之數，定於頃刻之間。一個有生氣的國家，它的眼

光必定，而亦必須，不斷的注射到「外在」的環境；一切「內在」的設施，其最後目的都在「對外」。官僚制度也逃不出這個「時代精神」的盪漾與薰陶。即就中國而論，戰國時代的策士，除了一二「孟軻之流」，沒有一個不以「富國强兵」爲號召，即下至雞鳴狗盜也都握有他們對外的職務。儘管大家心目不免也睥睨到個人的「勢位富厚」，而這些「勢位富厚」的取得多少都要借手於「富國强兵」的幌子，而後目的可達。那時代做官　最少做赫赫之官——必須有「外在作用」的根據！

到了大一統階段，六合併吞，外無勁敵；在「王者無外」的大氣度之掩護下，一切的人與物都流入一種「內向」的趨勢，目光亦再不烱烱「向外」，而只求在「宇內」保太平，也就是說，爲皇家保帝祚，爲百姓謀安居。賈誼的「治安策」可以代表這種「標準精神」，可說是一種「太平術」，與蘇秦張儀商鞅范睢的「縱橫術」「富强策」前後恰恰對映！

縱橫術富强策的實際結果，表現在戰國時代的「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大一統式官僚的治安策，太平術呢？其實際發展也並不是「億萬斯年安居樂業」的

烏托邦。外向的警覺性一行作廢，內向的「興趣濃」立刻倍蓰增高。列國間的「大政治」簑亡，繼起的乃是大一統朝廷上朝廷下「小政治」的蕃衍。這般政治的意義何在呢？表面上類都是國計民生，實質上逃不出官僚們候補道的功名利祿的明爭暗奪。

這當然不是說大一統階段內根本不產生「好官」。秦漢以來二千年的歷史，記載着不少的賢丞良吏，他們畢生的努力都正是功名利祿的否認。然而例外證明事實；在整個的局面看來，官僚傳統的惡劣化與官僚勢力的膨脹恰成正比例。如果外向型的官僚，安內爲的要攘外，內向型的官僚，到了末造，乃往往安外以來攘內。一切爲「內在」，但使外力可倚，不妨引虎入室。藉外力以爲爭內權之力，從石敬塘逕過秦檜賈似道以迄民初的北洋官僚，其行徑如出一轍！

有人問：中國近世的官僚與目前西洋各國何以異？我的答案簡單：千異萬差之中，最基本的是前者內向型，後者外向型，前者爲二千年大一統意識下之的產品，而後者乃文藝復興以來——尤其是法國革命以來，——積勢鑄成的列國表現。我們當前的急務也就是如何加强

若干年來的革命努力，趁目前千鈞一髮的時辰，把我們這個內向型的官僚傳統改頭洗心，轉變為澈底的外向型，以應付四面洪流的戰國局面。

要個個做官的人，敏銳地感覺一官一職統不是個人功名利祿的對象，乃必須盡忠竭力，做得精采絕倫，使國家得以光耀馳騁於國際之場——這乃是我們官僚傳統所需要的基本精神革命。

先認定了這個「基本點，」再讓我們更詳盡些陳說一般。

（四）

中國歷史上的官僚傳統還包含有四種毒質：

(甲)皇權毒。　官僚與專制，在歷史時間上說，是並世而生的。在功用上說，也確相得益彰，相助為理。國王要專制，當然不願意一些特權階級——世族——在身邊礙手礙脚。官僚們要以「平民」資格參預政權，當然也不願有一批「世嗣其官」的貴族們壟斷高位。這一

點是人類歷史上最有興趣的事實：專制國王拮頡的初期，多半都要同平民聯合戰線以向世族攻擊的。把世族打倒之後，半爲了勝者彼此分贓，半尤爲了治安需要「助手，」於是擢平民中「優秀者」而「官」之，就是官僚。就歷史的陳跡看，官僚的地位本來是在專制淫威下取得了「次等的統治職權」，這個職權必須有背後靠山——國王——的支持才發生作用的。由列國階段踏入大一統階段，王權擴大加强爲皇權。官僚的地位，對老百姓而言，要隨著皇權的高漲而高漲，但在皇權的掌裏，卻實際愈來而愈「賤」，結果養成了一種道地的官僚兩重人格——對下必作威作福，對上必阿諛奉承。按心理補償律看，凌下因爲了諂上，按實際取利上看，諂上爲的是凌下。並且「諂」之極，勢必「豪」。這乃爲封建階段，世族倒是爲自己而統治，大一統階段，官僚乃是爲了皇帝而統治，前者看統治爲自家事業，後者看統治爲替人「辦差」。惟其如此，一般官僚之辦差，其心目中所惓惓擁抱的大前提與其說是「致太平」，不如說是「得帝心」。「致太平皇家之務，得帝心卻眞正「俺的事」，昇官發財所攸關！「諂」若不足以得帝心，則「豪」亦在所不惜。諂與豪配合乃造成了標準的「妾婦之道」。

細驗此中，實存有一條眞道理——一個惡性的循環。有專制爲風的皇權，勢必鑄出妾婦爲道的官僚，而妾婦爲道的官僚，勢又更促進皇權之專制。到了後來，滿廷唯唯諾諾，非有個鞭笞羣倫的巨靈 Leviathan，萬事更無由推動，然而鞭笞愈厲，唯唯諾諾愈行，家有粉飾太平，指鹿爲馬，一旦關頭來到，全局瓦解土崩。國史上朝代的結局，類多如此！

（乙）文人毒。　官僚由那一種人來當呢？這問題當然關係官僚傳統的基本精神。中國歷史的演變，經過若干曲折與試驗，最後達到了「文人壟斷」的一途。整個的科舉制度，馴至八股制度，就是要製造出一種標準文人以充當官位。得文人以當官，皇權好像確得了一種理想的御用工具。而文人的做法也固自有眞——做文章爲主，做事爲副。半因爲文章本行內的拿手好戲，半因爲皇權淫威下，明哲者「但求無過，莫求有功。」於是我們的文人者，積千百年的經驗與苦心，磨鍊出一套「辦公文字」，以「等因奉此」「呈審」「待核」各字樣來諉卸責任，點綴威嚴。行之既久，亦竟自催眠，認辦文書即是辦事。唐納教授曾謂：西洋人辦事，「言論只是實行的起點，中國人辦事，言論乃是一切的終點。」殊不知我們文人式的官

僚，許多就根本認言論卽辦事，無怪乎事之得辦愈來愈少了！滿腦袋「文字神經」，而毫沒有現代人所謂的「技術感覺」，這可說是中國官僚傳統中的又一毒。

(丙)宗法毒。　按原則說，世族政治根據於「親親」，官僚政治根據於「賢賢」。前者重「血統」，後者貴「才能」。中國在戰國時代因爲戰的需求，小家族制度大有抬頭的趨勢，與倫理上的「個人主義」，政治上的「唯才主義」三位配合。到了西漢，大一統局面穩固下去，專制皇權爲了統制方便起見，特別鼓勵大家庭制度的復興。以「血統」爲出發點的「親親倫理」也就跟着昌旺。本來官僚制度應當無情地向「賢賢」途徑發展；却是在中國乃再被了大家族精神所籠罩，而倒浸入世族政治的意識形態，到處發揮着「親親」的情懷。如此，官僚傳統受了宗法觀念的再薰陶，結果是「用私人」「拔親友」習慣的樹立。

(丁)錢神毒。　二千年來中國官僚與商賈打成一片的。說是中國自來以農立國，其實自秦漢以來，商人在整個的經濟組織中早已取得主動的地位。在數量上，農實於商。在作用上，商是主體而農爲被動。歷代政府對商人的壓制政策，正足以反證商人力量的蓬勃。商人的

道德觀——不是農人的道德觀——實在支配了社會上的行爲而侵蝕到官僚的潛意識。雖然如此，平心來論，商本是生產路程上一種必需的因素，商人力量蓬勃，純粹商人的道德觀懸行，若未必完全是害。西洋近代文化可說是由商人充量發展其歷史上的作用，以「純商人」的立場與方法建立出這一百多年的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他們這個商人所成的社會，未能解決分配問題，最少也爲西洋解決了生產問題。在中國呢？官對商壓迫，但暗中每有一些人對商鉤聯，表面壓迫愈兇，暗中鉤聯愈力。至其極也，商不成商，官乃官商，商不能充分發揮商的歷史作用，而官又不敢明目張膽而爲商。結果，二千年的中華，乃流產爲一個生產分配兩無辦法的「赤貧圈」。王莽的新政，王安石的改革，多少都是失敗在官僚們的「愛錢癖」上頭商人愛錢，原分內事。官僚不愛錢而又期期愛錢，這乃是中國社會的真癥結。錢神之毒，到西晉時已發展到驚人的程度，而其尤堪驚人處，端在其毒之普滲入官僚層級中。十九世紀後，西洋式的金融制度，市場機構浸注到中國的經濟生命，影響所及，恐怕只增加了我們官場中的錢神毒，使其複雜化，微妙化些須。

這是對過去歷史事實的分析。也就是說，我們舊社會所交卸與我們的政治遺產，這般這般。是二千年來社會各面發展系積而成的遺產。其來源也遠而深，其剷除也當然繁而重。我們有時看得目前政府內也有若干大大小小現代化的官員，逐日在埋頭努力，沈默中與舊傳統搏鬥，更看得我們希望的當軸不斷地在上頭轉著萬鈞的臂力，振微起衰，我們不禁亦色然喜。但想到這個官僚傳統的雄厚歷史背景，又感得茲事體大，非從整個的社會組織，生活習慣，國民教育方針以至政府與社會各勢力的關係上多方着手，恐怕仍沒有法子把這個膏肓徹底除根！

——大公報三二、一、一七。

×　×　×　×　×

中　飽

林同濟

（一）

——官僚傳統的一面——

「中飽」兩字是中國社會上，政治上，一個關緊要的現象。

儘管你可以裝作時髦，把西洋近代——不，西洋此時此刻——所流行的種「戲法」，搴請過來，民主也好，獨治也好，行政調整也好，產銷統制也好，如果你不能先對「中飽」兩字弄得清楚，想出辦法，一切一切的「革新」都是落空的。不但落空而已，一切革新都要擴大了中飽的機緣！

抗戰到了今日，我們一方面儘管可以自詡成績不錯，一方面却不容不凜然感覺到這千鈞一髮的局面愈來愈不可「馬虎」。千條萬緒之中，關鍵的關鍵還在「中飽」二字。中國是不可亡的——除非了中國人自己中飽。自亡之道甚多：二千年來所製造出來的「自亡單方」，最靈驗的，恐怕就是「中飽」。宋之亡，明之結局，根本的膏肓，都在這裏。你我撫今思昔，不禁悚然！

中飽這個現象，古今中外都有。不過中飽而，成爲社會上生活常態，成爲政治上默認的制度，這是我們貴國「獨有之光」。習慣浸注人心，中飽中飽，乃竟是民族第二天性了！

「中飽」這個名詞，起源於韓非子：

「薄疑謂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窮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這是個絕妙好辭！「飽」字所以描寫其狀態。「中」字所以說明其方法。姦吏之所以「飽」，全靠其「中」。以「中」取「飽」，是爲中飽。

何爲中？中者，中間地位之謂也。上有君王，下有百姓，中間有官吏。用現代術語說，一邊是政府，一邊是人民，中間有官僚 Bureaucracy。政府與人民彼此間的行動，不能直接達到對方，於是乃必須有一般人在中間媒介一切，料理一切。憑藉着，或利用着，這種政治上的中間地位，對一切經手的事件或接觸的人物取得了法外的收入——這個微妙勾當就叫做中飽。

(二)

原來任何社會，發展到某種程度之後，一個行爲往往不能很有效地很迅速地由發動者直接達到受動者，行爲所牽連的人數愈多，所籠罩的面積愈廣，則直接達到的可能性也愈少。於是乃必須組織「機關」以爲傳遞行爲的工具。「機關」這個名詞，可說是現代文明生活最流行最象徵的一個字樣。其實一切機關，種類雖然是五花八門，作用却根本一致。機關的作用，根本上在「傳遞」行爲，也就是說，把一個意定中的行爲，由一個發動點推行到一個或一些受動點。推動的方法，儘管可以因事而異，而推行的目的都是要達到「傳遞」的職務。所以，在這一點上看去，一切機關原來都是一種「中間人」，就好像陰陽電間的導電體，男女間的媒人一樣。英文字來得妙：英文的媒人」就是 go-between ，蓋遨遊兩造之間的一種動物也。是多餘的，却也是必須。盤據着這種「必須」的中間地位，他可爲善，可爲非，能令公喜，能令公悲。勢力非同小可！機關者，文明生活中所必須的各種 go-between 也。

這裏恐怕就是人類文化的中心問題了：文化愈進，機關愈多；機關愈多，中間人的勢力也就愈大。換句話說，組織生活愈發達，中間人愈不可缺；中間人愈不可缺，他們乘勢欺人

的可能性也就愈來愈兇！如果整個文化問題可以說是生活的組織問題——也就是說行爲的機關化問題——那麼，我們儘可以說整個文化問題實在就是「中間人」問題。如何需要中間人，不斷地加緊需要中間人？却是同時又如何訓練中間人，駕御中間人？如何能利用中間人而不爲中間人所利用？如何能得到中間人的好處而同時又可以免掉中間人「從中取飽」？文化愈進步，這個問題之待決愈迫切。解決有方，則社會的生活可保健全，文化的生命可求展進。解決無方，則社會的生活脫節，變爲畸形，變爲惡性，而文化的生命也就頹萎，殭化，而漸就消滅。古今來多少的民族，多少的文化，都是消滅於「中間人」勢力畸形發展之中！

中間人的種類繁多，但兩種最重要。在經濟領域內則爲商人，在政治領域內則爲官吏。兩者相較，官吏尤重於商人。憑藉着他們的政治上的中間地位，官吏乃握有控制經濟中間人——商人——的能力。官吏可以叫做任何文化或社會中「最樞紐的中間人」。官吏之良否，實在是任何文明社會先決的問題。官吏良則社會生活入軌道，而文化可以有煥發燦爛的機會。官吏不良、貪、暴、狡、悖，則一切的一切無從調理。

中國社會的癥結便在沒有把官吏問題弄清。政治的中間人集團（官吏）利用着他們扼要的地位來天羅地網似的向社會各種團體搜括剝削。結果「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誰佔便宜呢？曰：官吏的私囊！政治中間人飽腹便便，當然國家和老百姓要餓肚子了！大家都說中國貧窮不堪。其實，中國不貧。中國者，實乃中飽之國也。「中」飽，所以「國」貧矣。

（三）

前面說過了，中飽這個現象，古今中外都有。在我們國史上，什麽時代才開始變爲一種普遍現象？變爲一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呢？在我看去，其兆在戰國末期，其成倘在秦漢之交乎？

何以故？曰：以官僚制度正在這個時代成熟故。

中國歷史的劃期問題，近年來頗有一番熱烈的討論。史前期，無論矣，只好讓濟濟的考

古專家去挖地掘墓，搜尋那碎石片陶。我們目光的對象，還在有史後的民族文化的推移。就史後期說，因爲立場不同，結論也復五花八門，言人人殊。尤其是一般譊譊不休的唯物史家，拿着一二時髦公式硬劃出什麼奴隸時代，什麼亞細亞式時代，什麼農業時代，商業資本，前資本主義時代。詰屈聱牙，勉强附會。不久前我曾經說過了，眞正有意義的歷史必定要採取「文化綜合」Cultural-Synthetic 或「文化統相」Cultural-Configative 的方法。（參閱拙作「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用這方法來爲中國史劃期，結論簡單得很。第一是殷商後期至西周之末。第二期是秦漢以至清末。在這兩大期間，則有五百五六十年空前激變的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時期——爲其轉捩。戰國以前，我想把它叫做「大夫士時代」。戰國以後，我想叫做「士大夫時代」。中國整部歷史的演化，可以用犖犖八字扼要說明：由大夫士到士大夫—用簡陋的西洋新名詞說，便是由世族政治時代 Aristocracy 到官僚政治時代 Bureaucracy。（見前「大夫士與士大夫」及「論官僚傳統」）。

官僚制度是在戰國時代建立的，到了秦漢大一統的皇權下乃集其大成，定其骨架。此後

歷朝互有更易，但總打出秦漢的輪廓。世族政治下，統治者的地位是世襲的，是特權的。官僚政治下，除了皇位以外，統治者的地位是人人以平等資格，通過一種旌拔手續後，皆可取得的。任何社會，在世族政治崩潰之後，都必須建立官僚制度。官僚制度的建立，是任何文化內戰國時代的特徵。官僚制度的大成，是戰國時代進入大一統時代的兆象。戰國時代，因爲有了「對外戰」的需要，又有了「貴士傳統」背景的關係，其官僚制度比較還都能夠維持它的運用上的健全性。一進到大一統時代，外患既消，貴士風氣日加遠隔，官僚制度往往表面上愈加輝煌，實質上乃反要起始展開腐化頹萎的程序。中飽這個現象，在戰國時代或許是變態，是例外，到了大一統時代却就逐漸變爲普通慣例了。我們中國歷史上所表現的命運是如此。如果將來全世界不幸也照例流入大一統的皇權，則除非人類能特加警惕，施用精密方法及堅强意志來思患預防，恐怕整個官僚制也免不了要重蹈中國的故轍。（其實在目前西方各國，遠見的學者已注意到所謂「官僚問題」了。）不過這些是未來世界的事，我們中國人的問題還有更急於此者。我們的身世恰當着世界史上大戰國時代的高峯。我們所急急首要

注意的，世界列強的官僚制度，正發展到他們戰國時代所應有的強度效率的標準；並且這個標準是一本着歐西文化的浮士德精神而充分發展出來的。內在矛盾，仍然不免。但以此我們當日的戰國七雄時代，目前列強的官僚制度已經是健全完善得數十倍；以此我們秦漢以來大一統局面下的官僚制度，那就真是一薰一蕕，根本上無從計較了。

當然，我們並不是主張二千年來的中國官僚，沒有一個秉公盡職，廉潔持身。二十四史所特加褒揚的循吏，豈不是百世流芳，千秋照耀？然而例外正足證明一般，儘管楊震能夠四知辭金，范柏年高唱廉泉讓水，中國的官僚傳統，整個的說去，終不免是一個中飽集團。你罵它不應該貪汚，殊不知貪汚就是它的先天職務。歷朝開創之初，中興之際，也不是沒有一番治本治標的努力，只是大運所趨，有如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唐以前猶可說，宋以後真不堪提及了。

拿我們二千年大一統局面下日就頹委的官僚制度，要求同現時血氣方剛的大戰國的官僚制度爭扣時代的使命，必敗無疑！我們惟一的出路只有在新的猛省中把我們整個的官僚傳統

接着大戰國的需求澈底地改頭革心。中國的官僚制度必須由龐大的「中飽」集團改革爲民族的「中堅」工作者！

(四)

我另文論到中國官僚傳統的特質，以爲有四種毒質應當注意：

(甲)皇權毒——官僚制度與專制皇權配合，養成了「妾婦」派頭。

(乙)文人毒——官僚制度與文人階級配合，煞鍊出「作文不作事」的祕訣。

(丙)宗法毒——官僚制度與大家族制度配合，樹立了「任用親私」的習慣。

(丁)錢神毒——官僚制度與商人社層配合，發展出「貪財舞弊」的風氣。

最後一點，屬於本題範圍。我想補充幾句話：

說到中國文化，一般一知半解的「專論」寫作者，類皆能鸚鵡式地跟着王公大人們的後頭大喊什麼中國自來以農立國，所以中國文化根本是農業的。這種說法，充分地表現了形式

分析派的結論往往得粗失精，似是而非。須知自戰國後期，最少自秦漢以來，商人在中國整個的社會經濟裏早已取得主動的地位，在數量上，形式上，儘管農重於商；在作用上，動力上，商是主體而農爲副。自從土地由「世守」而變爲「自由販賣品」的那一天起，中國經濟便向着「商人中心」的類型溺入，社會上實用的一般道德標準也早就向著市儈化一途徑墮落。最能夠代表這個市儈化的文化象徵，就是「錢」的一個字。「錢神」的力量在兩晉時代已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在錢神權威磅礴薰陶之下，中國官僚再也不是貴族時代的「君子」，用「玉」以表其威儀，用「劍」以表其榮譽了。玉與劍所以象徵古代「大夫士」一心一意要以「統治」爲志願。後代的「士大夫」畢竟只是官僚，只是精神市儈化的官僚，「中飽」實其大欲，「孔方兄」是他們的宗教。

然而如果中國官僚能夠徹頭徹尾地市儈化，中國文化或許還可以找出一個新出路。西洋資產主義社會的誕生，原因不一而足。其中一個重要的條件可說是商人團體有了充分機會表現他們的機能。這是歐洲一段極關重要的歷史：商人以中間人的地位來懋遷有無，逐漸積蓄

了一批賸餘「資本」來興辦種種的「企業」。商人的行爲本來是與生產過程沒有直接關係的——雖然是他所完成的「中間人的任務」大有間接促進生產的價值。到了商人擁有資本而成爲企業家，他却是堂堂大步直接踏入「生產領域」了。歐洲社會所以能由商業革命進到工業革命而蔚發爲現代資本主義之花者，這是一個大關鍵。

中國商人的命運大大不然。他雖然以中間人的地位操縱了中國經濟的命脈，但是他始終不能擺脫政治中間人——官僚——的鉗制，而充分發展其機能。歐洲的「商」，壓倒了「官」而由資本主義的形式創出來現代的富豪政治 Plutocracy。中國的「商」，始終受制於「官」而官乃應用「中飽政治」的形式而挫阻了資產主義的誕生。中西封建世族政治崩潰後的歷史模型的最大同中的不同點，就在這裏。

中飽這個現象何以能挫阻了資產主義的誕生呢？

上面曾經說過了，中飽的意義，是憑藉或利用政治上的中間地位，對一切經手的事件或接觸的人物取得了法外的收入。由此看去，中飽是一種政治手段。政治手段，取得經濟利益

，在個人享受來說，當然是佔便宜，在社會的立場看去，却千眞萬眞是一個「經濟損失」。工人以勞力掙錢，企業家以資本致富，商人以販賣取利。三者，直接間接都是經濟行爲，都有經濟價值。有經濟價值的，都可以增加社會財富。官僚發財，乃由「中飽」。其發財也，不但沒有出相當經濟性的代價，乃還要妨害了人家的經濟行爲。

好像是奧本海末Oppenheimer提到的。以政治手段取得經濟利益的，它的經濟上的作用等於搶刼。在「中飽政治」下，受搶刼的是農工商。商雖然可以把負担轉嫁於農工，但本身始終打不出一塊頭地來而成爲歐洲所謂企業家者，一則賸餘資本太小，二則法外干涉大多，三則官家競爭的可能性太大。資本太小根本談不上企業。法外干涉太多，則卽有企業，也要「枯涸」於層層勒索之下。勒索猶爲小事，進一步的辦法乃是化「商辦」的企業而爲「官辦」或「官商合辦」。卽就民國以來各處的情形說，多少商辦的企業，辛苦經營之後，略形起色，官老爺立刻大擺而來，接收而出。接收之後，這些企業的命運，多半沒有下文。

我們這裏並不是主張「官辦」不應該。世界時勢所趨，「官辦」範圍，大約日加擴大，

而也需要日加擴大。我們所要指出的：在中飽問題沒有解決以前，中國的「官」是沒有辦事興業的資格的。沒有資格，却大步前來，頤指氣使，既然不能收到政府經營政府統制之效，却反把資產社會的誕生機會全部窒死了。歐洲的資產主義並不是令人滿意的寧馨兒，但最少還解決了生產問題。中國傳流的「官辦主義」只加強了「中飽」的機緣。不能「生產」，更說不到「分配」。分配分配，「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五）

論到這裏，我們想連帶談一談民族性問題。官僚與商人都是中間人。他們的立身，行事，思維，確確有種種相同之處。中國社會是官商中心社會，也就是說中間人得勢的社會，所以中國人實際的人生哲學以至中國人的民族性都大大沾染上了「中間人的色彩」。妥協，折衷，好講價，喜取巧，惡極端，反徹底，善敷衍，厭動武……處處都呈顯一種道地的「中間人精神」，「官商者模樣」。

然而官商之間究竟也有異點。這個異點，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坐享辦」與「投機辦」之別。商要投機，官却要坐享。兩者目的都在發財、取利。但是「坐享法」比「投機法」高明得多。最要的一點：投機法需要三分「冒險性」，坐享法却是十分安全。投機法有得有失，坐享法必得無失。

記得是奈特教授F.H.Knight吧。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冒險，叵測，無營利」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據他的意見，商人取利，究竟要花費一番經營的苦心苦力。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冒險」。凡是做商人的，自己不是生產者，沒有固定的收入，只能利用他的中間地位，來懋遷有無買賤賣貴。這種居奇趕市的行為，我們叫做投機。投而中則為富家翁，投而不中則為破家子。行市是沒有一定的，是極端叵測的。有可知之數，有不可知之數。在兩者之間要及時及地下一個決斷，不是容易的事。一須敏銳的感覺，二須精細的分析力，三須堅提的意志，四須迅速的行動。最後還有一點：輕險之心，換言之，不怕冒險。古語云：勝敗，兵家之常。商人也必須有這種精神，看「得失」Profit or loss為常事。這種精神不但是

「投機」的必須條件，並且也可以部分地當作商家營利的倫理上的根據與說明。

中國官僚發財的方式是一本着萬全主義而形成的。此中絕無「危險」。一來，他們不出本錢，根本就不怕「蝕本」。許多官僚可以憑藉他們的政治中間地位，向各種「民間」企業取得「乾股」的，都是無本可蝕而却有利可賺。二來，他們可以假公濟私。即就近十數年來的情形說，一般「近水樓台」的「公僕」大半都理會紐約倫敦各種證券大是發財的捷徑。當然天字第一號的大財還是碧眼黃鬚子專有品；却是桌下散落的麵包碎片，到了中國人手中，也自稱豪一世，喫嚼一生。於是不少的摩登官，也就緊巴着上海香港的小市盤，顯身手於世界金融大舞台的尾角。名爲投機，其實還是坐享。因爲中國官僚式的投機是不含「冒險性」的。中則錢歸我，敗則賬歸公。至於國內市盤上，則更是一操一縱本來都在王公大人的掌中，當然百無一失。

我們提出乾股，市盤兩例子，不過是表示中飽的路徑大可以隨着經濟組織的現代化而取得「現代化」的定向。然而根本的意義，還是與從前的「受苞苴」「括地皮」以至吞公款等

方式一樣——以政治手段取得經濟利益：有百得，無一失；是坐享，不是投機。用美國俗話說：「賺舒服錢」Make easy money 慣賺舒服錢的，不肯冒險。中國的官僚與歐美的商人，心理上，精神上的根本不同，恐怕就在這裏。

我們上段說過：中國人的民族性處處都顯出一種道地的「中間人精神」，「官商者模樣。」我們此刻好像又應該修正一句：「官」的模樣更要濃厚於「商」的！中國士大夫多少喜歡投機，但是他們更想「坐享」。就是投機，他們也無形中以坐享方法出之。官商是中國社會的中心，而官更爲中心之中心，無怪乎官的「坐享癖」蓬蓬勃勃，差不多要演成全民族的第一希求，第二天性也。

這種坐享心理，窩金心理，不但於得財的方法上顯出來，於守財的方式上更可看出。傳統的方式，最主要的是「買地」。我們官老爺括完地皮還鄉，仍是要歸錢於地皮，因爲地皮是穩固的財產，有了數百千畝地，一生坐享其成，此外更不願冒險企業了。有一個事業，却確確時常副着做着，那就是「開當鋪」一類的勾當，因爲高利貸也是一種「舒服錢」，吻合

官僚的脾胃！

摩登的方式，如出一轍，所不同者，就是添了一層「外國勢力」，的關係。在官僚的眼中，外國勢力是二千年來求之不得的「安全保障」。於是買地則在租界，存款必定外國銀行。甚至情願倒出一筆「安全手續經」Safety fees，只須他那批累萬「橫財」得以安存於花旗，匯豐、正金各銀行。最近十年來，受了歐美商人化潮流的薫勸，「投機」的念頭逐漸活躍，居然也買起種種外國的證券。股票也好，債票也好，都是「發財妙道」，趨之若鶩。無奈宇宙間本就沒有絕對的安全。數年前美國鋼鐵公司證券慘跌，我們京滬一帶富家翁，不少的哀號跳痛哭！（去年滬港淪亡，聽說損失更是不貲——三二、五、二〇、補注。）

傳統的守財方法，埋錢於國土之下，摩登的方法，却送錢到外人之手。前者把資本「凝固」起來，後者把資本「倒流」出去。在任一形式下，不但所謂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不會誕生，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秩序也不能出現。二千多年來只是中飽集團說要着中飽把戲，留下來的却是一個「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的國家！

「碩鼠碩鼠，
無食我苗！
三歲貫女，
莫我肯勞！」

抗戰已是三年，我們對這問題可有澈底的辦法？

二九、九、一五、寫於昆明

文化的盡頭與出路

林同濟

——戰後世界的討論

（一）

據說，羅斯福總統曾經表示這次大戰不當無精打彩地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I），而當予以一個富有意義的命名。有些人士以爲這次戰爭乃現代人類文化存亡所由決，因而提出「文化戰爭」War for Civization的名詞。

這名詞雖是笨重，確有相當的涵義。一則這次戰爭，由深處看，實是整個歐洲文化～～～或以歐西文化爲動力而形成的現世界文化——若干的結果。二則如果希特勒東條得勝，連這個缺憾的文化恐怕也要「不在人間」——它要頹萎，要殭化，終於要消滅。

原來歐西文化，走到今天，已抵達了一個偉大的「盡頭」「Cul de sac。它就等於中國文化上的戰國後期，希臘羅馬史上的帕洛普尼大戰時代。到這時代，一個文化的若干基本的生命源泉竟發生了一種顯似不可排解之矛盾與衝突。結果，有兩路可走：(一)獨夫之路——一拳樸殺了那些生命源泉以消滅矛盾；(二)哲人之路——在那些矛盾與衝突之中，重建出一個新平衡。

獨夫之路，即是希特勒（或東條）所取之路，愷撒，秦始皇曾行之於先，得到手的是逐漸枯涸的文化，哲人之路，有史以來尚無其例，曉不得聯合國方面可有一個眞正能見能行的

政治家？

（二）

討論歐西文化，就像討論其他一切文化一樣，最要徵妙地鑒別它本體發展的線索，如它在本體發展中所受到外來混入的因素與潮流。本體是主，外素是賓。外素的作用，只能附着本體而發生，而不能撇開本體而自展。外素而能撇開自展，那便是原有本體的消滅與另一文化的出現。

歐西文化是最難了解的，因爲它的外素最爲復雜。最重要的外素有二：（一）希臘羅馬的古典傳統，（二）希伯來的耶穌教。這兩種外素的影響，起泛而深入，然而終是外素。

歐西文化本體發展的線索，到今日爲止，有三點可言。歐西文化過去的燦爛表現，由於這一點的分途發揮。歐西文化此後繼續的存在，要靠這三點的協諧。

這三點是什麽呢？我們可以名之曰：貴士傳統，個性渙發，國命整合。

貴士傳統，即所謂Aristocratie Trabitioun 者，乃歐西文化的「基本資金」，歐西文化本體的發源就在這裏。這一點，論史者多半忽略了，結果，不但抹殺了一個根本的史實，而且忽視了當前文化的癥結之所在，讓我們這裏先插一句話：貴士傳統的衰亡實乃目前歐西文化的一個大險象，要拯救歐西文化，恐怕必須爲貴士傳統尋求一個新表現的路途。

第一步要說淸楚的就是，貴士傳統不是貴族制度。貴族制度是指特權世襲的社會結構，貴士傳統乃是指一種無意中多少自成一套的君子行規，道德感，人生觀等等。按過去的史實說，貴士傳統是附着貴族制度而產生出來的。但我們儘可想像那一套行規與道德感，一經產出之後，大可以脫離其所自出的制度而獨立存在於社會間。貴士傳統與貴族制度不必有不可分離的因緣。

歐西的貴士傳統，當然是它的封建社會的產物，就像中國古代的大夫士風尙一樣，以「忠」「勇」爲中心概念。是一種「武」的氣概。受了耶教的「憐憫弱者」「服事上帝」的影響，再加上來源複雜的「騎士情愛」的薰陶，乃逐漸形成一種比較文質彬彬的體裁。並且有

味得很，貴士傳統發達到意識的最高峯，並不在封建全盛時代，乃在封建開始崩潰，王權列國成立時期，尤其是在十七八世紀的法國。

貴士傳統是一種流行風尚，一種時代「癖氣」Temper，並沒有什麼成文的檔案，而有系統地規定其內容。必要下個界說，我以爲它的中心母題當是根據時間證實的價值而產生的一種層級差異之承受態度。這裏面有幾點堪注意的。(一)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即中國之所謂「有別」。(二)這差異有「層級」的，分上下的，即中國所謂「有序」。(三)層級之分，是以價值爲標準的，即中國所謂「尙德」「主善」。(四)而這價值並不是抽象地由形而上學先驗審定，乃必須是實際上由比較悠久的「時間」，從實踐證明的。英國柏克 Edmund Burke 所謂「民族的智慧」，與中國所謂「先王之道」，根本初無二致。貴士精神總帶三分「保守」，此其好處，也是其缺處。

差異分上下，上者以「莊嚴」之態，「寬大」之心來治下。下者以「忠誠」與「虔恪」來事上。前者即所謂 Nolesse oblige。後者要歸結到殺身致命，即歐洲騎士用紅黑兩色以象

徵勇與死者之意。

但無論爲上爲下，對彼此的職分，都必有一種「守」的精神，「執」的精神。而這種的「守」與「執」，乃都是根據在一種激烈的「榮譽」觀念上頭的。英國人所謂 Character，中國人所謂「立行」，殆皆含此義。

這種「立行」之中往往藏有一道深深自克自制的功夫。由於自克自制，還產生出兩種標準的貴士情操，一卽「公允」Fair blay 二卽「持中」Moderotion。

這些就是我所謂貴士傳統——歐西文化的第一道源泉。

(三)

貴族制度，因爲內在的腐化，失去了維持現狀的能力，代起而來的就是號稱代表全民的中產階級。這種情形，在歐洲，約當法國革命的前後，貴士傳統，隨着貴族制度的崩潰而受指摘，受攻擊。一道新的文化源泉，湧將出來——就是，個性渙發！

個性換發雖然是中產階級抬頭的產品，但其「兆」實由貴士傳統發生出來的——它是出於貴士傳統而反於貴士傳統的。它出於貴士傳統，因為整個的個性運動可說是貴士的自尊心之普遍化到平民。它又反於貴士傳統，因為它的基本原則，邏輯上，現實上，都勢要與貴士傳統的中心母題相衝突。

「個性表現」是這道新源泉的中心母題。

個性表現，包含兩種意義。(一)個人有子然獨立獨在的價值，不必靠任何人以及任何人為的事物而取得其存在的理由。(二)凡是個性——個人的才、智、情、欲——都有發揮的權利。換句話說，個人要自由。為了什麼理由呢？曰，為了大家平等——天賦的平等。人人平等，所以人人有自由。這種在平等立場上談自由，當然與那在差異結構下談自克的貴士傳統發生衝突了。

個性的表現，循兩路發展。(一)循理智發展，蔚成為科學與機器文明。同時，功利主義的觀點，也就在這裏抬頭。運用純功利的清斷邏輯以決定行動的「經濟人」，不但無形中成

爲學術思想上的普通假定，而實際社會生活上確也層見疊出了。（二）循情感發展，遂成爲大量藝術與文藝。同時，大部分作品，根據在個人本位的感覺，多流入「印象派」的抒情。個性渙發的潮流是歐西文化中最活躍最燦爛的因素。它開放「天才」，它鼓舞「創造」，它催促「進步」。

然而它最健全的表現多少須是建設在貴士傳統的上頭而取得的調和，可是近來的一般趨勢，乃大有撲殺貴士遺風而放蕩直奔下去。因而重量不重質，重存在而不重價值，重發洩而不重規則，重享受，重權利而不重犧牲。

換句話說，個性渙發，出於貴士傳統而又與貴士傳統相對，到了對盡貴士傳統之時，個性渙發的自身乃流爲一種「無標準」「無約束」的頹廢的虛無主義，而創成社會上靈魂與物質的混亂與不安。

這是歐西文化中現有的一個基本矛盾。

（四）

與個性煥發差不多同時萌兆的就是國命整合的潮流 National Integration 。這是歐西文化的第三道生命源泉。

淵源甚複雜，可說是種族與地理，戰爭與歷史，王族與民心，宗教，文字與利益種種因素有意無意的產品。在歐西史上，通常叫做民族運動或國家主義。但我們這裏另有理由，把它叫做「國命整合」。因為我們所指，不但政治方面、而經濟、教育、宗教、文藝皆在其內。

國命整合潮流是由於一種敏銳感覺，看待整個國家為一個有機體的單位而欲把它變成一個理想的事實。可說是個人醒覺的擴大化。在這點看去，實代表個性煥發的一種「昇華」。有了歐西人的敏銳的「個性」意識，也就有他們那樣敏銳的「國命」意識。另一面看，國命意識却亘是個性意識的對反。後者是離心的，前者是向心的。就事實上說，有了近數十年來

個性放蕩的流弊，才有了近來國命整合的加強。

國命整合的意義是用集中計劃與法律規定來實現一種超個人，超階級，超職業的民族協體的慾求；而這個協體的維持則又靠所有份子對於這個「較高體」的義務觀念以及一種不斷對外競爭的感覺。這裏面所包含的若干概念——全體、集中、計劃、法定、義務、一致對外等等——都不免要與個性渙發若干原則根本不相容。

整合所以壓制個性的奔放，而增强全體的活力，但到了個性壓倒之時，創造的靈機消滅而國家的活力也失去了根蒂。

這是歐西文化中現有的又一個矛盾。

（五）

簡括說來，歐西文化，演到今天，貴士傳統被個性渙發驅除殆盡，而個性本身的命運又受了國命整合的威脅而日近毀滅。國命整合的自身呢？失去了一切貴士「公允」「持中」的

精神，始終還沒找出一個方法來解決國際的衝突。一世之間，兩次大戰。國命整合乃出全體戰而走入自戕之途。横着眼前的需要，顯然是一種世界性的組織。

希特勒的辦法是以武力征服一切，把國家，個性與貴士遺風一概蹂躪起來而建立一個機械性的「車同軌，書同文，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秦始皇式的世界帝國。這種一拳撲殺那三基本源泉的辦法，終使文化走上頹萎的孽程。

希特勒絕對要不得！

人類所需要的是一個世界組織，根於一種多面的和諧，一種動性的平衡。在一種全世界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國際善意的競爭而又可以免戰；集中計劃與規定而又可以無傷於個性的發展；允許自由平等而又可以保全貴士式的價值感覺與榮譽情操。

也就是說，文化有否眞正出路，端看我們能否於若干基本的矛盾間尋出一個新和諧。這便有待於聯合國的政治家的遠見與手腕了。

大公報三十一年七月

附錄

歷史警覺性的時限

雷海宗

多年來中國學術界有意無意間受了實驗主義的影響，把許多問題看得太機械，太簡單。以史學爲例：一般認繁瑣的考試或事實的堆砌爲歷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論；卽或是知道於事實之外須求道理的學者，也往往以爲事實搜集得相當多之後，道理自然就能看出來。實際恐怕絕不如此。歷史的了解雖憑藉傳統的事實記載，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種人心內在的活動，一種時代的精神的表現，一種個宇宙人生觀應用於過去事實的思維反應。生於某一時代若對那一時代一切的知識，慾望，思想，與信仰而全不了解，則絕無明瞭歷史的能力。對自己時代的情形與精神愈能體期，對過去歷史的了解力也愈發深刻。由另一方面言，一個時代愈發展緊張生動，那時代少數警覺性深刻的人對過去的歷史也愈發看得透澈。一個完全平淡靜止的時代，對於任何過去的大事都絕無明瞭的能力。歷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個人格與時代精神的一種表現，並非專由亂紙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種知識。

上面一段話或者不免過於抽象，意義不免過於晦澀，但我們舉出具體的例證之後，問題大概就容易看清了。在任何

民族的生命中，歷史的了解力或警覺性都是爲時甚暫的一種活動。中國秦漢以下的二千年間史料的豐富使人氣悶，以史家自命的學者車載斗量，但始終沒有一種歷史的作品。原因也很簡單。二千年來的中國社會，雖間或有小的波動，但一向絕無真正的變化或新。一人身處完全靜止的環境中，整個的人格，整個的心靈，也都是靜止的。此種人格所影射的一切也當然是靜止的，對過去真正停滯的時代當然看爲停滯，即或對於活潑生動的時代也難以看出道理。因爲人格中所完全缺乏的，絕難在外物中找到；正如宇宙中有許多顏色與音響爲人類的耳目所不能見聞的一樣，因爲這些聲色超過我們感官構造的範圍，一個貧血症的人格，對於機械的史料或者還能做點排列的功夫，遇到富有意義的史料反要手足無措二千年來對於戰國以前的歷史毫無辦法，就是因爲這個原故，後世對於所謂三代文化的懷慕與崇拜證明一些空虛無物的人格仍能感到戰國以前的偉大；但偉大處到底何在？卻是二千年來無人能夠了解的一件事。大致講來秦漢以下改朝換代的平淡故事，同化了全部的中國歷史，所以三代也不過是三個朝代而已。這是如何可憐的一種看法！

一個民族歷史警覺性的最發達的時間，不過三百年。前此是信仰混沌的階段，雖有歷史命運的嚮往，但無清楚的觀念，根本談不到歷史的了解。此後則一切都糊塗渺茫，思想與想像都微弱到苟延殘喘的地步，正如我秦漢以來二千年間的情形。兩者之間有三百年的非常時代，是文化的最高峯，民族的事業達到頂點；向後回顧，來龍清楚；向前瞭視，去脈分明。這是人類心胸最開朗的時代。但絕峯之上，難以久留，明古知來的幸運階段轉瞬即逝。前此的心地光明一變而

為一場糊塗。這個短暂的幸運階段在中國就是戰國時代，在歐西就是今天。

中國的階戰時代，前後二百五十年。歐西自進到戰國後，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但歷史的了解力或警覺性並非與時代始終的。時代的初期警覺性仍甚微弱，到末期就又趨於模糊。眞正發達的時期，還不足二百年。中國此期所遺於後世的唯一作品就是左傳。左傳是戰國前半期的作品，在當時可說是一部通史。殷商西周的事跡，當時已不十分知清。著者爲慎重起見，由平王東遷後開始，敍述到著者生前的九十年間爲止。全書的線頭雖然非常複雜，條理卻十分淸楚，使讀者能夠身臨其境，對春秋時代整個的國際局面以及少數大國的內部狀態都能一目了然。當然只有大手筆才能有如此成就，但是大手筆必須生於大時代纔能具有如此能力。春秋。時代雖然在前，但我們今日對它的認識遠勝過戰國，就是因爲關於戰國時代沒有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試想：若無左傳一書，我們今日對於春秋時代豈不也要如對西周一樣的恍惚？

歐西對西史的了解，由法國革命開始。法國革命前尙無名實相符的史學。今日惟一認爲有史學價值的革命前的作品——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於價値在文字而不在史解。革命方興了解力仍其淵弱。到1850年左右，歷史的警覺性纔成了知識階級全部人格的一個不可缺的部份，少數哲學頭腦特別發達的人纔對古往今來的一切比較徹底的認識。由1900年到今天，歐西人的歷史意識可說已發達到最高峯。而今而後，只有倒退，雖有再進一步的發展。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後

，思想漸受統制。這種趨勢，只有愈趨強烈，減輕的機會或後消滅的可能絕無。此種非理性，反理性的神祕主義，最多不過五十年後一定要成了籠罩整個歐西文化的滿天黑雲。獨立的思想漸被撲滅，歷史的了解也必同時消亡。史學的消滅與哲學結束是同一件事的兩方面。五十年後，歐西思想界一定要有類似雜家者出現，雜家是哲學發展的殿軍。同時史學界也必要開始呈現司馬遷史記的沒落形態。太史公是中國古代偉大史學消滅的象徵。二千年來學術界對於司馬遷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間中國沒有史學的鐵證。史記一書，根本談不到哲學的眼光，更無所謂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較整齊的排列而已。後此的所謂史書，都跳不出此種格式，甚至連史公比較清楚的論理也學不來。文化精神衰退的一落千丈眞可驚人！

戰國時代爲何能明白過去歷史，因爲戰國時代的文化最爲複雜，最爲緊張；任何時代的任何事蹟在戰國時代的心目中，都不至顯得生硬。反之，比較簡單鬆懈的時代，對於戰國時代根本無從了解，因爲戰國的許多潮流與線索是其他時代的人所不能想像的。只有複雜緊張的戰國纔能產生少數特別複雜緊張的人格，只有這種人格才能對古往今來的一切設身處地的去體會。此種能力，在春秋以上，在法國革命以前，絕無出現的可能。中國到呂不韋時代，歐西到二〇〇〇年左右，這也就成爲無人能夠想像的一種異能。

我們混沌的過了二千年的靜止生活。今日幸逢歐西的盛大時會，受了外力的渲染，又第二次的得有明瞭歷史的具備

•深望國人善於利用機會，把埋沒二千年的歷史徹底尋出一個條理，不要終年累月的在訓詁考據中去兜圈子。中國只要不亡，此後千萬年都是我們可以盡情沉湎爲訓詁考據的時間。眞正明瞭歷史的機會，卻是一縱卽逝，最多不過還有五十年的工夫。中國的亂紙堆，二千年來堆得太高，若必要把許多毫無價值的問題都考證清楚，然後再從事於綜合了解的工作，恐怕是到人類消滅時也不能完成的一種企圖！

尤有進者。歐西人無限的欲望與追求，使他們發現了許多古民族歷史。埃及、巴比倫、印度以及希臘羅馬的發展經過，今日歐西人所知道的，在許多方面比較古民族自己當初所知道的尤爲清楚。這種擴大心胸的機會是如何的難得！有心的人，爲何不拚去由堆滿故紙殘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爽塵，來到海闊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戰國策半月刊第十一期——

（完）